

微 志 书

河西区档案馆
2023 年 12 月

编委会

主 任：王高峰

副 主 任：唐艳刚 芦德军 徐 波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马永顺 马 涛 王儒臣 乔红伟

刘世娟 郑文才 赵晓光 夏 静

郭 枫 黄军生 崔文锦 韩宝安

彭太刚

执行编辑：王文振 单晨阳 李乃鹏

目 录

北洋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	001
不负芳华，巾帼铿锵	033
以笔为剑 以墨为锋 以字为刃	037
海河西岸见证风云变幻 百年学府培育国之栋梁	042
言传身教铸家训，躬身示范践初心	049
敏学不倦 日新有恒	054
赓续红色血脉 讲好河西故事	060
滋兰树蕙 赓续华章 勤学自立 成才报国	061
尚勤致精 经世济民	067
传承百年师范教育 孕育基础教育文脉	074
百年传承历久弥新 以人为本自强不息	080
文以明道 健以利身	085
尖山南围堤河——解放天津攻城突破口遗址	091
一纸诠释“资料性著述”的人大精品	098
河西梁家园是北洋大学的发祥地	104
天津市河西区革命史之五村农民反霸斗争	118
年鉴条目编写之我见	126
天津德式风情区始末	134
挖掘红色档案资源，讲好河西故事对策与研究	144

卫津河上繁忙的砖瓦运输 153

北洋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

王儒臣

1895年，由晚清重臣、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大营门外沿用原梁家园村博文书院旧址（今河西区海河中学）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文中除“第四节”外均称北洋大学），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这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国立新型大学，饱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和战争颠沛流离之苦。特别是从我国新文化运动至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列强、侵略和封建军阀专治的统治，北洋大学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定地站在时代的潮头，积极探讨、践行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通过阅读马列主义革命书籍、成立各种爱国组织与团体、出版红色文化报刊、下厂下乡为工人农民宣传演说、组织反帝反封建示威游行、开展大规模集会声讨、选派代表上书请愿等多种活动方式，广泛开展爱国学生运动，发动广大民众进行不懈奋斗与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革命的胜利高歌呐喊，孕育出一批具有高昂的爱国热情和改造中国强烈愿望、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充满蓬勃朝气、坚定忠贞的先进分子和革命志士，在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史上、乃至我党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新文化运动至“五·四”运动期间，北洋大学在历次爱国学生运动中每役必从，始终战斗在最前列，是天津高校重要的骨干力量之一。

早在1915年9月，革命先驱陈独秀满怀为求得一代青年解放思想的远大志向，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是年冬，张太雷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北京大学转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与同学们一道参加反对袁世凯和抵制日货的斗争。从此，北洋大学便成为他从事天津早期学生运动、创建地下党组织的革命生涯的起点。1918年，张太雷与李大钊建立联系，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北洋大学带来了曙光。当时，京、津两地均成立学生救国会，张太雷被推选为北洋学生代表、天津学界的领导人之一。他带领北洋爱国青年学生参加反对段祺瑞政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举行，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曾在北洋大学头等学堂毕业的高才生王正廷，受孙中山选派，作为南方政府的代表加入了“中国代表团”。是年2月，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感召和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张太雷不顾学校当局的控制，以北洋法科学生为骨干，发起组织成立了爱国青年进步团体“社会建设会”（即“社会改造社”），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革新政治的途径。他坚持阅读《新

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引领北洋有志青年坚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4月底，从巴黎和会传来消息：《凡尔赛条约》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坚决反对。5月2日，北洋大学闻讯后，全校师生集会，速打电报给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对王正廷等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所持的态度“表示全力支持”。5月4日，当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点燃了反帝爱国烈火，其势如暴风骤雨，闪电般地席卷全国。5月5日，北洋大学、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南开中学、成美中学（今汇文中学）等校的学生最早起来响应。北洋大学奋起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率先连发3份电报：致电北京大学“惩贼有勇，极表赞同，以后共同进行”；通电北京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即“北京学生举动情殷爱国，所拘十九人恳请释放”；致电上海南北和议代表“北京学生警告曹（汝霖）、章（宗祥），情殷爱国，政府拘留十九人，乞速电请开释。”同日，北洋大学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5000人在南开学校操场集会，筹商营救北京被捕学生的办法。据《益世报》记载，北洋大学6日曾致巴黎和会中国专使电：“巴黎胡公使转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各专使钧鉴：‘为谋世界悠久之和平，贯彻公理战胜之精神，青岛、胶济应直接返还我国，二十一条条约亦当然废除。务望诸公力持到底，不获所愿，不签合约。全国人民实同此意。北洋大学全体学生同叩’。”一纸电文，使北洋学子王正廷倍受鼓舞，深感并非是他一个人在坚守着对国家主权的捍卫之

心，身后有天津母校师生、乃至全国人民的鼎力支持。在北京政府授意签约之紧要关头，巴黎和会的消息正是王正廷抱着“势必死争”的信念，维护国家主权，不惜违背禁令，通电国内彻底揭露反动政府的训令，阐明一旦签字将“气绥势孤，永劫不复”。北洋大学热血青年慧眼识破英法美日意等国的强权政治，旨在实现其列强重新分赃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之目的，全校师生奋力坚守对中国主权的捍卫，并在第一时间给多方致电的爱国举动，受到津门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5月6日，北洋进步学生张太雷、孙毓麟等组织联络官立、私立中等以上10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和北洋大学学生近千人，齐集北洋大学礼堂（今河北工业大学）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决议组织“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举行声援北京学生正义斗争的示威游行。北洋学生队伍走在最前列，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强烈谴责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誓与北京学生站在一起，共赴国难，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而斗争。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各大中学校的万余名爱国学生在南开学校操场集会。警察厅派出数百名保安围堵学生，禁止游行。在张太雷的带领下，北洋和直隶女师等校的同学冲在队伍前头，到省长衙门请愿。同学们打着“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反帝爱国标语，齐声高呼“打倒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霎那间，呐喊声和口号声响彻津城大街小巷。在不断高涨的反帝爱国热潮中，时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赵天麟、学运领袖张太雷等人，置反动政府以高压手段煽动迫使北洋学生停止爱国宣传于不顾，依然支

持学生走上街头，集会讲演，与北京、上海的学生组织紧密配合，携手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5月12日，北洋大学、成美中学、南开中学等15所大中学校，参加各界群众2万余人在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召开的追悼北大烈士大会。同学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杀卖国贼”“唤醒同胞”小旗子进行集会声讨，强烈谴责军阀政府的残酷罪行，受到醒救国人、同仇敌忾的社会效果。5月14日，北洋大学、高等工业学校等13余所学校代表在水产学校（今水产前街41号）召开会议，成立“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津学联”），并通过学联《简章》。张太雷被选为学联决策机构评论会评议长，主持讨论斗争的部署和策略事宜。5月23日，在学联领导下，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孙毓麟、校游行队伍总队长陈泮岭组织联络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等15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万余名学生，在南开学校操场集会，议决全市各校进行联合总罢课抗议行动。会上散发罢课宣言，历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的种种罪行，声明“抵制日本，且杀尽卖国贼以自救之”。天津学生的这次总罢课行动，声势浩大，轰动全国。天津学界开展总罢课期间，北洋大学组织成立44个反帝反封建爱国讲演团。张太雷率领演讲第二团的林汝植、陈汝良、李则良等同学，冲破警察、教育两个厅的禁令，赴塘沽工厂农村进行多场讲演。向各界群众宣传工农大众遭受压迫剥削的根源及谋求解放的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罪行，唤醒当地民众的思想觉醒。

6月5日，是天津爱国学生运动进入高潮的一天。在津学

联的统一布置下，北洋大学等 19 校近万人，一大早就齐集南开学校广场，进行宣誓仪式。号召全市爱国青年“即至牺牲生命，亦期挽救爱国同志，及唤同胞共扶危局”。这些要求，成为北洋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下午，北洋大学孙毓麟，会同兄弟校的代表向伪省长曹锐请愿。当路经大胡同时，见省公署前的金刚桥已经吊起，阻断了学生过桥，足见反动当局何等恐慌。学生代表冲破警察的包围和拦阻见到曹锐后，围绕声援学生的抗议行动，展开对话。曹对代表提出的条件拒不作答，只是要求“学生即日复课，不准上街游行，更不得有损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代表对此语极力反对，曹甚至骂道：你们“示威游行会造成天津地方糜烂、日本海军登陆、引起战祸种种危险。”代表当面揭露了省长的卖国嘴脸，坚持不达罢课目的决不上课。

北洋学生运动的怒涛，使军阀政府惊恐万状，不断加大对该校的监视管控力度。警察厅在校内贴出告示：“禁止学生演说、游行、散发传单及各种图画情事；派警察在校门口巡查，不准学生出入校门，违者逮捕法办。”针对反动当局的蛮横镇压，张太雷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倾校突围，外出演讲。7 日上午，北洋学生列队出发，在校门口与森严把守的警察发生冲突。张太雷率七、八十名同学奋力突围。巡官见状，鸣笛警示，集合警察持枪猛追，打开刺刀对准学生，气势汹汹地对学生进行威胁恫吓。巡官派人电告省府，速调步兵马队前来镇压。但学生们毫不畏缩，与警察对峙起来。校学监闻讯赶来劝阻，学生才返回校园。刚回校片刻，衙门二、

三百名步兵马队赶到，把学校层层包围，水泄不通，如临大敌，使这所人文荟萃的高等学府，一变而为监狱牢房。反动政府的镇压终究阻挡不住爱国学生点燃的革命烈火。8日13时，张太雷和演讲团的同学身掖传单，袖藏小旗，巧妙地溜出校园，摆脱了军警的监视。各讲演团分散在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附近繁华的街道上，意气激昂地进行讲演。听众鼓掌不绝，连警察听后也打动了心弦，对学生演说未加干涉。演讲结束后，同学们结队游行，行进到市总商会门口时，派代表会见叶兰舫会长，要求全市的商人罢市。在同学们的强烈呼声下，叶答应召开各行商董事会，组织商人上街罢市。队伍来到省公署，提出与省长曹锐交涉，曹不敢露面，先派副官出见应付。同学声明非见省长不可，曹又派教育厅长出来，学生仍不答应。曹被迫接见了张太雷等11位谈判代表。代表开门见山地质问曹：为什么摧残教育，指使警察把守校门，把学校变成监狱？为什么没有言论演讲自由？为什么派侦探跟踪学生等一连串的问题，弄得曹张口结舌，无言应对。张太雷义正辞严地向曹提出：必须答应尽快撤退把守校门的军警，允许学生自由地在街上宣传演讲等项条件，终迫使曹不得不从。最后，代表当面通知曹锐：“明天（9日）在河北公园开会，请省长派兵维持秩序”。在革命正气的威迫下，曹当面接受。9日13点，北洋大学参加在河北公园举行的天津各界群众2万人公民大会。大会决议要求北洋政府严惩国贼、拒绝签字、取消“二十一条”。号召教育、工商、妇女、新闻、宗教各界团结起来；商界实施罢市，响应上海罢工、罢课、罢市运动。北洋大学主

动与天津产业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进行爱国宣誓仪式。10日，天津商会组织全市店员总罢市，连人力车夫都行动起来开展罢工。北洋学生不惜长途跋涉，冲破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和拦阻，与商界店员参加游行。同学们在北大关街头里巷和商店门口手持木棍站岗放哨，每2小时换1次岗，指挥车辆行人，维持市面秩序。北洋学生“持棍站岗”的举动，很快传到了北京城，使得卖国政府十分恐慌，连夜派人赶赴天津，以威胁恫吓学生相利诱，对学生进行打压。然而，反动政府企图以此来阻止学界罢课、工人罢工、商会罢市的目的并未得逞。天津塘沽码头工人坚决拒绝起卸日货，实施全员就地罢工；3个火车站的铁路工人，联合奋起举行罢工运动；天津商界的罢市行动更是不断深入。这些正义行动，吓坏了天津军阀当局，给专事贩卖日货的奸商及日本帝国主义以无情的揭露和沉重的打击。

迫于全国各地群众革命行动的强大压力，北京政府于6月12日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北洋学生口诛笔伐，呼吁政府拒签巴黎和约。18日，在市学联的推动下，在工人阶级、商界参加运动的影响下，“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北马路前进里宣告成立，北洋大学校友马千里当选为副会长。在运动中，面对反动政府策划的恶毒阴谋，强令学校提前放暑假，借以瓦解破坏学生运动。马千里团结动员进步学生、工人、妇女等各界群众投入爱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24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合作成立“抵制日货委员会”，张太雷以学生代表参加该会工作。他带头深入城厢各

店铺，对商标、包装、品种逐项检查，与各行业订立抵制日货、禁止米粮出口的公约和办法，断绝日货来源，给日本经济侵略以沉重打击。28日，在全国人民的齐心奋争下，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北洋大学集会庆祝，欢呼胜利。“我一生有一桩得意事，就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句话，正是北洋学子王正廷的肺腑之言、奋斗之果。至此，历时50余天的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以实现，取得决定性胜利。天津学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北洋、南开大学等学运龙头校，仍是引领津门青年学生深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排头兵。

8月23日，为抗议山东军阀马良屠杀爱国群众的暴行，天津近千名学生抵京，会同北京3千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取消戒严令，撤换并惩办马良。天津各界联合会推派代表组成请愿团，与山东、北京代表到总统官邸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下午，徐令卫戍司令部、警察厅调动2千武装军警驱散学生队伍、逮捕了25名代表。反动派的凶残激起学生和群众的义愤。张太雷带领学生火速赶赴北京，组织领导营救被捕代表的斗争。在新华门浩浩荡荡的学生请愿队伍中，张太雷怀着准备奋斗、牺牲的精神，发表演说：“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抛头颅、洒热血，决不迟疑！”以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满腔热忱唤起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的觉醒。斗争坚持到第3天，警察厅又持枪逮捕了天津学联负责人马骏。张太雷和请愿学生仍坚守轮番演说、散发传单，揭露和痛斥反动政府的罪行。在津、京、冀等爱国请愿团体的共同抗争声讨营救下，

迫使反动当局于8月30日释放了被捕学生。9月16日，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在东南城角草场庵成立，北洋学生谌小岑为社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9月下旬，为继续抗议山东马良杀害群众的暴行，天津各界选派10名代表组成请愿团再次晋京请愿，北洋校友马千里参加了请愿。10月1日上午9时，京、津、鲁请愿团32名代表来到新华门，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徐派人同请愿团交涉，相持到下午7时许。徐竟令百余名军警，当晚把32名代表押送至警察厅非法关禁起来。代表们在狱中勇敢抗争，宁死不屈。在全国爱国团体的声讨和抗议下，徐释放了被拘禁达38天的请愿代表。10月10日“双十节”上午，北洋等大中学校 and 市民2万余人齐集南开广场，举行天津历史上首次国民大会。警察厅长扬以德恐惧万分，速派几百名警察把守广场出口。到中午时分，学生队伍手持标语小旗，高呼口号，冲破一道缺口，相拥而出，直奔警察厅，要求厅长出来答复同学的问题。扬以德动员各校校长劝诱学生回校。抗议队伍一直持续到半夜，北洋学生回到西沽校园天就快亮了。20日，马千里等率领2千多学生和万名市民聚集东马路青年会，直奔省公署见曹锐。马千里等11名代表，强烈要求省长严惩镇压爱国学生的罪魁祸首。经严正交涉，曹对扬以德绳之以法，撤换了其警察厅长职务。12月10日下午，在北马路总商会院内，隆重举行“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联合会”（津新学联）成立大会，500余名男女学生代表参加会议。经选举，推选出43名评议委员会评议员，张太雷被选为新学联演讲委员会筹备委员。新学

联这一革命进步团体的产生，掀开了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团结战斗的新篇章。20日，北洋大学参加在南开操场召开的天津史上规模最大的国民大会，10万民众愤怒声讨日本侵略山东，抗议日本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枪杀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和市民的罪行。北洋同学现场目睹了焚烧查获的10多辆卡车日货的情景，怒火燃烧，气冲霄汉，纷纷抢着散发“大会特别传单”，举行示威游行，把开展以声援山东、福建人民，发动商店店员为主体的抵制日货的斗争推向了高潮。是年底，由北洋大学学生会创办的《北洋大学日刊》出版。这纸每逢罢课后出版的刊物，有力地推动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1920年初，直隶军阀和天津警察厅对学生爱国运动采取极高压政策。1月23日，天津新学联委员在东门里魁发成洋货商号查出隐匿日货不报之事，当学生发现后，奸商勾结日本浪人毒打殴打学生。翌日，警察保安总队再次毒打爱国学生，并逮捕了前往省公署和警察厅交涉的各界联合会负责人马千里等24人，被强行关押到警厅拘留所，查封了爱国团体。29日，北洋大学等20多所大中学校数千学生和各界群众，经金钢桥过金华桥，直冲直隶省公署请愿。慑于各校展开斗争的声威，省长曹锐却深躲不出，非但拒绝出面相见，反令全副武装的军警动用大棒、枪托、水龙头血腥镇压学生，有60多名学生在与军警搏斗中受伤，被紧急送往医院，酿成津沽骇人听闻、轰动一时的“九一念九”（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政治事件。北洋的谌小岑参加了请愿斗争，担任后勤交通任务。他见状连忙跑到法租界打电话，向北京学联报告。流血惨案

刚过，他又速向北京发送“通讯稿”，并油印寄发各地学联和报馆，呼吁声援天津学生运动。自1月24日至2月8日，反动当局逮捕拘押了周恩来等各界代表及学生20余人。至4月7日，除有病或年幼等原因被保释者外，其余被拘的21人被移送至地方检察厅。在身陷囹圄的艰难环境下，周恩来6次向狱中的革命勇士讲授马列主义课，进行绝食等形式的斗争，终于本年7月17日全部获释。周恩来在狱中亲自撰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手稿，经马千里修改后，在《新民意报》上公开发表，引起天津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响。

经过“五·四”运动这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洗礼，北洋大学爱国学生与全市青年学生紧密配合，团结工人阶级和其他各个阶层，发挥了先锋队作用。不仅带动天津广大爱国青年齐心奋争，推进我国历史空前规模的革命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才干，成为胸怀远大抱负的革命战士。

二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北洋大学已经有了中共党员，有的同学参加了天津二区委学生支部工作。

1920年10月，张太雷在北京加入李大钊发起创建的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天津最早的共产党员。11月初，北洋学生谌小岑经李大钊派遣，与张太雷在特别2区大马路（今建国道91号）一家裁缝店楼上建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

成员有北洋学生吴南如，并主持起草了中国第一部团章，是我党成立前夕建立较早的地方团组织之一。此后，张太雷积极开展工人运动，赴长辛店组建劳动补习学校，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1921年1月4日，在北洋大学教授、俄共（布）党员鲍立维（柏烈伟）的帮助下，青年团小组成员谌小岑等在天津创办专供工人阅读的《劳报》，行销至唐山、南口、长辛店等地，成为天津首份工人运动的刊物。1923年，谌小岑参加从事妇女运动的进步团体“女星社”，并创办《妇女日报》。该报曾为北洋大学爱国学生运动发声，发表刘清扬《北洋大学运动的我见》文稿。是年3月26日，津埠各界、各团体市民20余万人齐聚南开大操场，召开“力争旅大还我国土”市民大会。此日为中国旅大收回日，而“日本指而不与，并拒绝我否认拒绝二十一条牒文”。北洋大学带头与汇文中学、南开学校等10多所大中校学生冒雨参加了这次反帝爱国集会。同学们高举校旗，呼喊“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还我国土”等口号，经南马路，东马路、水阁、毛家夥巷、锅店街、估衣街、竹竿巷、针市街、北马路、东门，直到广东会馆，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支持。天津《益世报》报道了大会消息：“援助外交，为国民最有价值之运动，更足增国家之光荣。”

为加速建立天津地方党组织，张太雷等共产党人进行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1924年5月4日，市学联在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中山堂”（黄纬路五马路一带）召开700人参加的纪念五四大会。会议讨论了两个议案，其中“援助北洋大学学潮”

议案被列入重要议程，推动了北洋大学学生运动的开展。是年9月，在法租界24号路普爱里34号（长春道普爱里21号址）建立了津门第一个党组织即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从此，天津党组织走上发展轨道，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有了前进方向，为北洋等学运龙头校深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带来生机和活力，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1925年，上海日资纱厂资本家血腥镇压罢工工人，残酷杀害工运领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天津援沪活动风起云涌。天津地委发动大中校学生，联络工人与其他团体，进而“唤醒市民，一致行动”。北洋大学学生自治会率先行动起来，发表《宣言》，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并组织学生先后参加了6月5日、14日、30日天津3次市民大会，发出“誓死与英、日断绝经济关系”等铮铮誓言，激发了学生反帝士气和革命爱国热情。北洋学生联络其他大中校连日举行罢课活动，支援上海人民罢工、罢课、罢市斗争。“五卅”风雷，声震霄汉，激荡津门。在北洋大学等校的带领下，天津广大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热忱愈加高涨，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天津的殖民统治。

三

大革命失败后，我国革命进入最为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北洋大学继续保存和发展党的力量，促使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亡国的危险威胁着每一个中华儿女，愈加唤起北洋广大师生对日军侵略、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及“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愤怒和抗日救亡的爱国热忱。时任机械系教授王季绪，为抗议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愤而进行绝食斗争，以示抗议，并通电全国，呼吁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校领导的义举，为之震动，立即得到全市学生的支持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函电慰问，各大报纸亦发表他的消息和社论。当时，北洋大学师生抗日呼声十分迫切，率先成立华北学生第一个抗日组织“抗日救国委员会”。校学生会召开大会，一致决议派代表赴南京政府请愿。请愿团一行经过诸多挫折和斗争抵达南京时，蒋介石虽被迫在市党部礼堂接见了学生代表，但蒋竟用“读书救国论”掩盖其卖国投降的可耻行径，当场回绝了代表提出一致对外、抗日救国要求这一实质性问题，最终请愿无果。接着，同学们纷纷要求上街游行，亦遭反动军警百般阻挠而未成。请愿学生怀着失望、抑郁和愤慨的心情北返津城，正赶上天津陷入恐怖状态，学校被迫停课。校方租用法租界“大陆货栈”，才给回津同学安置了临时避难所。北洋大学这次南京之行，沿途目睹了许多残酷的现实，心潮澎湃，更加觉醒起来，深感只有指望共产党，积极探索挽救国家危亡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新途径，才是唯一正确的光明之道。日军侵华事件后，北洋师生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沦亡，千百万劳苦大众遭受蹂躏的现实，把深入军营开展慰问、捐送、劳军等活动、支援抗日前线作为头等大事来做，还开展了抵制日货、反对日军武装走私的斗争。

是年9月24日，北洋大学等20余所中等以上学校的40余名代表在河北公园召开会议，成立“天津学生抗日救国会”，北洋大学被推选为15所执行委员校之一。学生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影响深远，“彷徨苦闷、忿愤胸膺”的莘莘学子有了主心骨。

1932年，天津抗日救国组织和团体相继成立，抗日呼声愈加高涨。北洋学子忧心国家大事、民族利益及革命前途，主动开展阅读进步刊物和社会科学书籍的读书会活动。成立“社联”“荒火社”等进步组织与社团，一些同学在党领导的天津进步团体中担任要职。这些组织与团体以进步学生为骨干，以读书研究为号召组织起来的，起到传播进步思想、联络校友、积蓄扩大进步力量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3年初，北洋大学发展赵庭良等一批同学入党，建立了校模范支部，全校的进步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校学生自治会的活动亦恢复健全起来，选举刘锡珍、黄诚等为领导成员。学生会适时开展反对校当局拼凑内战经费、取消“贷书制”的斗争。

1935年，日本策动制造华北事变。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北洋大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曾在北洋预科读书、为校学生自治会成员的黄诚同学，也是清华抗日救国会主席。救国会在《怒吼吧》创刊号上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学生的共同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黄诚作为学运领袖，怀着满腔沸腾的热血，带领学生走上街头，以血肉之躯呼唤抗日救国，揭露日本企图吞并中华的野心。11月底，天津市委恢

复后，帮助北洋大学组建党支部，加强校领导力量，使全校的学生运动更加高涨，成为津城学生运动最主要的力量、最活跃的高校之一。12月初，北洋联络南开大学、法商学院等10余所大中学校5000多名学生，参加了在南开操场召开的“一二·一八”罢课大会，痛斥国民党妥协退让政策，揭露日本吞并华北的阴谋。当日，学生游行大军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口号，唱起抗日救亡歌曲，向市民、工人和店员宣讲抗日救国道理。这次天津学生大游行是全国第2个发动学生运动的城市。

1936年1月2日，北洋大学积极倡导京、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建立。经两地学联决定，利用寒假共同组建宣传团，分别深入河北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在党的领导下，北平组织第1至3分团，天津组成以北洋大学、法商学院等校为主体的第4分团。天津团冒着寒冬，出北仓、汉沟，赴武清、安次、永清、固安等地。一路上采取文艺、演讲、访谈、办农民夜校、召开专题会议等形式，向广大农民进行共同抗日、救亡图存的宣传教育。特别是结合华北危急的形势，在街头演出《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目，激发了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各分团在保定固安会师时，团员们一致同意北洋张多疆同学提出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团体，以担负起革命使命的倡议。2月16日，平、津团回到北平马神庙北京大学三院红楼时，召开各团代表会议，通过了保定提议，宣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成立。由于该组织是党直接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会议严格规定了秘密

的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平、津学生这一爱国行动，如星火燎原，席卷全国，拉开了全民抗战的雄壮序幕。之后，北洋大学成立“民先队”组织，徐瑞恩、张多疆、刘讷同学参加了市民先队和市学联的工作，并领导校学生会和民先队出版《北洋学生》《民众周报》等进步刊物。为此，同学们心潮澎湃，充满豪情壮志，兴奋地唱起《国际歌》，相互激励奋勉，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团结的更加紧密。5月28日，北洋大学等大中学校万名学生会师官银号，参加天津召开的市民大会，举行抗议日本增兵华北和屠杀我同胞的抗日救亡游行。游行中，北洋大学有的同学登上世界书局二楼发表演说；有的同学爬到电车顶部向涌入街头的市民群众散发传单。队伍到达南开操场时，通过《团结抗日宣言书》，决定罢课3天。这一震动津沽之举，提高了党在学生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心目中的威信，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6月中旬，天津学生运动处于高涨时，国民党政府下令北洋大学等校提前放暑假，并调动军警和特务包围学校，搜捕学运积极分子。针对反动当局对学生的镇压，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议定利用暑假走向社会，到工农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按任务分工，北洋大学与三八女中负责津郊王兰庄村的义教点工作。工作队负责人为北洋大学张多疆，义教队还有徐瑞恩等10余名北洋同学。王兰庄的农民绝大多数是佃户，地瘠租重，专靠熬硝盐维持生计，加之屡遭保安、盐警队的盘剥和日寇的扫荡，村民生活极端贫困。义教队驻村后，深入各家各户调查研究，展开以抗盐税为代表的斗争，保护了

农民的切身利益。通过下地劳动、与村民促膝谈心、举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编演抗日街头剧《一颗炸弹》等，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群众齐心抗日，使农民的阶级觉悟得到普遍提高。经过义教队员的辛勤工作，在王兰庄这块土地上播撒下革命的火种：发展刘振奎等10名农民入了党，帮助村里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培养一批青年农民成为抗日骨干，组建了津门西南部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暑期结束前，在校当局找茬打压进步学生的情况下，北洋大学地下支部宣告成立，张多疆任书记，并发展一批同学入党。钱万生被选为“华北学生联合会”常委，傅景洪参加了天津地下区委和校地下支部的领导工作。至“芦沟桥事变”前夕，全校“民先”队员发展到60余人，占在校学生人数的六分之一，革命队伍逐步壮大。该校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借津门学运声势大、蓬勃发展的东风，主动向工农兵方面开展工作。许多民先队员坚持在柳滩等地举办夜校，向工农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工人中扩大影响，在农村中开辟阵地。按照“天津学生绥远抗战后援会”的意见，组织同学开赴津郊西姜井，开展野外游击战法训练，强化行军演习；前往绥远前线进行实地慰问、演出、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援军队抗战保国，使大多数同学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

日军攻陷天津后，北洋大学遭浩劫，被迫西迁入秦，走上抗日救亡新的战场。

据资料显示，芦沟桥事变后，从北洋大学前往西安的学生人数约占应到人数的70%以上；学校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除有的参军、奔赴革命根据地、南下的外，去西安的仍占有较高比例。曾就读机械专业的史绍熙同学，民族灾难冲破他伏案苦读、急于求知之心，一度投身于救国洪流，参加了江苏家乡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工作。当得知母校内迁的消息后，他毅然奔赴西安，完成未竟学业。当时，暂留在天津的北洋部分学生，以流亡学生的名义，离津会聚太原、南京等地，组建“平、津流亡同学会”“天津流亡同学抗敌后援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流亡太原的同学，分别进入晋察冀边区、晋绥、晋西北、太岳区等抗日革命根据地；流亡南京的同学，由于遭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奔赴太行区等抗日根据地；张多疆、傅景洪等学运骨干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在国统区任职的同学也果断弃职，前往抗日前线。

1937年8月，以北洋大学等4所高校为基干，合并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在临大期间，校党支部继续领导学生开展爱国学生运动，创办抗战刊物《西安临大校刊》《平津学生》；发展钱万生、刘天民、牛宝印等一批同学入党，党的力量得到加强。为把联合体校的进步学生团结起来，推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地下党员和民先骨干首先组织各校成立同学会；在此基础上，统一建立联校“学生抗敌后援会”。平津各校的民先队员还组成平、津民先区队。在“九·一八”6周年纪念

日，民先区队制定抗日救亡宣教计划，与西安学联共同组成 8 个街头宣传队，分赴县城乡村，围绕形势与时局、国家观念与服兵役等内容，为民众进行抗日动员讲演。并为群众演出《芦沟桥》《流亡三部曲》等革命剧目，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10 月，西安各界人士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 1 周年大会，大批临大学生参加了会议。师生们还冒着寒冬，参加西安各界人士举办的抗日动员大会，进行游行演讲活动。西安平津同学会和“临大”适时开设军事教育训练必修课，组成 3 个战地服务团，深入国民党部队宣传抗日救国，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前线将士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1938 年 3 月，“临大”千余名师生怀着对日寇的憎恨和报效祖国的志向，辗转南迁，抵汉中、城固、沔县（今勉县）等地。4 月，改校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是我国抗战时期在西北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在陕南异常艰难的环境下，教师住茅草屋生活授课，学生驻“七星寺”挑煤油灯夜读。许多具有爱国情操的学生，在祖国危难之时，并非闭门苦读圣贤书，而毅然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中来。广大师生一方面克服重重困难，攻克科研项目，取得诸多科研成果。一方面把学校命运与国家战略、民族复兴相结合，肩负起开发西北、奠民族复兴之基的历史使命，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同学们通过组建读书会、演讲会，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有些同学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各界救亡团体举办抗日形势报告会、专题座谈研讨会，宣传全民抗战的重要性。师生们还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组

织话剧团，在汉中大剧院演出《回春之曲》；组织歌咏队，下乡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成立漫画班，创作抗日漫画，制成展牌，在街头、学校巡回展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信心。全校学生积极开展募捐、献金、义捐、义卖活动。当许多女同学得知前方抗战将士急需鞋袜的消息，3次进行义卖，一针一线地缝制成鞋袜，捐赠给抗战将士，谱写出战时山沟沟里高校的壮美诗篇。此间，“联大”率团赴华阴、潼关、大荔、平民、朝邑等地前线劳军，为西北青年训练班、抗日军政大学及绥远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爱国学生。教育部撤销西北联大后，于1939年8月成立“国立西北大学”，直接受陕西省委领导，党员发展到100余人。西大抗日进步社团不断壮大，仅以读书会为主的“译丛社”“自修社”“毕业之友社”就吸引了几百名爱国学生参加。1942年，国民党刮起反共逆流，以校长赖琏为代表的西大反动当局，与汉中警备司令部、川陕鄂区绥靖公署相配合，通过向学生发警告信、编造黑名单、拘禁审问、扣发毕业证书、开除学籍、勒令退学、记大过处分等方式，疯狂地对革命师生进行政治迫害。西大地下党坚持对师生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以无私无畏的胆量、勇气和责任与反动势力进行顽强斗争。1944年3月，校内反动党团与汉中军、警、宪、特相勾结，对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实施搜捕行动。同学们再次与反动势力展开荫蔽斗争。抗战胜利前夕，西大抗战刊物《笃行学报》及“星社”“西北风学社”“春秋学社”“北方学社”等学生社团兴办起来，学生抗日救亡的信念更加坚定。1946年，国民党掀起反苏、反共游行。西大

校长刘季洪指使特务学生无端制造反共口实，在校内鼓动学生签名，遭到全校师生的强烈抵制。西大党组织及时在城固县城召开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通过了《会章》，发出《告各界人士书》，彻底粉碎了校当局反苏反共游行的阴谋。4月初，为揭露校当局对学生自治会的干预和破坏，党组织组成2个“请愿代表团”，分赴重庆、西安，访谈当地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秦风工商日报》刊载了西大学生自治会《宣言》，吁请各界的支持和声援。此时，刘季洪策动纠集校内反动势力，配合军警又捏造出“学生火烧校本部”的谎言，占领法商学院，与自治会相对峙，武装镇压学生，逮捕了党员刘存生等30多名爱国学生。在党的指示下，学生自治会讲求斗争策略，同校内反动党团进行针锋相对的较量，在法庭上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对学生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罪行。由于全国民主力量的支持，加之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邯郸《人民日报》、张家口《晋察冀日报》、上海《文汇报》和《时代日报》等全国新闻媒体的声援和支持，被捕的学生全都出狱，使自治会的民主权利得到维护。

抗战期间，北洋大学有近千名师生报名从军。仅1944年，就有300多名师生奔赴前线，有的到农村参加游击战，有的投入抗日救亡新战场，开展武装斗争或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地质地理系郁士元教授，参军时已43岁，仍主动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被《大公报》称其为“抗战以来大学教授之申请入伍者，此为第一人。”投笔从戎的北洋学子黄诚，下到部队曾做抗日救亡的统战工作，在川军中建立秘密的中

共特别支部。皖南事变爆发，黄诚不幸被捕，被惨无人道的敌人关押进江西上饶集中营。面对敌人的酷刑烤打，他不畏强暴，大义凛然。虽多次昏死过去，仍视死如归，坚贞不屈，义正辞严地与敌人进行对抗。他说：“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从事抗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变初衷！”转年，年仅28岁、正值风华正茂的黄诚“临难铮铮风骨好”（陈毅诗），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北洋有些同学，虽没有参军报国，但仍心系着抗日救国大业，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北洋法科的徐谟同学，毕业时参加国家外交官大考，获得状元。抗战中，这位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时刻关心抗日时局。每逢年底使馆办公经费有盈余时，都及时如数归还外交部，同事们都觉得很惊奇。徐谟总是这样说道：“省下一文，前方将士可多一滴汽油，一粒枪弹，杀敌卫国，全赖此也。”

从1938年至1946年间，北洋大学（西北联大、西北大学）在陕南大山里办学7个多春秋，共培养出本科毕业生9257人，大都扎根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为我国抗战期间毕业生人数最多的大学。北洋专心教书育人，自觉投身抗战实践，既给汉中人民带来生机勃勃的气象，又在抗日烽火中铸就一种“西北联大精神”即：“团结御辱、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兴学强国”的创业精神，“公诚勤朴、矢志报国”的奉献精神，并在陕北、全国广为传播，

五

北洋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天津革命斗争中最为活跃的重要力量。

1946年1月，恢复国立北洋大学，回迁天津。当时，部分学运骨干因全面内战爆发而转移到解放区。学生回津后，在地下党组织、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领导下，学生自治会积极开展工作，学生运动又有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从1945年10月至1948年底，全校师生举行了针对国民党颁布“两个甄审办法”的反“甄审”斗争；进行抗击美军暴行的游行罢课斗争；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三反斗争；开展以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摧残教育事业为主要内容的“敬师助学”运动及反南迁斗争等。有80%以上的同学参加反美、反蒋游行示威和各种活动，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国兵强奸女大学生事件。令人发指的消息传到天津，北洋大学洪惠如等女同学群情激奋，怒不可遏，火速行动起来，在校园贴出第一张抗议美军暴行的海报，要求校学生自治会采取行动，抗议美军对我国民族尊严的污辱。校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立即成立“抗暴委员会”，很快贴出壁报、快报和标语，历数美军在华的暴行。北洋联合南开大学共同发表《告全国同学和同胞书》，与全市15所大中学校50余代表成立“天津市学生团体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简称抗暴联），并派出学生代表于12月29日上午，

向正在天津基督教维斯理堂（今滨江商厦址）作礼拜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递交抗议书。各校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揭露国民党卖国和内战面目，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把反暴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到月底，各校学生抗暴罢课风潮席卷整个津沽大地。

1947年元旦，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拟安排举办鸡尾酒会，招待驻华各国总领事。一大早，在地下党组织下，北洋大学800多名学生游行队伍，由校自治会理事长程秉元带队，沿途汇合25所大中学校2000余名学生，打着“天津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幅门旗，齐唱《抗暴曲》，高呼“美军滚出去！”等口号，举行抗暴大游行。当北路游行队伍经小王庄、元纬路、金钢桥、东马路、罗斯福路（今和平路）、烟台道向市政府集中时，与南路千名学生会师。北洋大学的领队洪涛、许显忠和南开大学领队，代表天津学生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今赤峰道图书馆老楼）递交抗议书，通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撤出在华美军。游行至河东美国兵营时，北洋同学书写的中英文字“美军立即撤出中国”大标语，张贴在兵营显要位置。下午，两支队伍前往市政府，包围了封建衙门，向副市长张子奇递交请愿书，提出“就地严惩暴徒”“美国佬滚回去”等要求。队伍行至老西开教堂，美军发生吉普车撞伤1名6岁儿童而狼狈逃窜的事件。愤怒的学生立马把受伤女孩送进医院，又调转队伍，直奔市政府，要求市长杜建时惩办凶手。经一番谈判，杜应允了学生提出“美军撤出天津、追查惩办肇事者”等4项条件。结果这天晚上，伪政府安排的

酒会泡了汤。1月3日，北洋等校再次举行大游行，要求驻华美军惩办凶手，强令其立即退出中国。经连续不断抗暴斗争的冲击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声援，美国被迫宣布其驻天津、北平、青岛各地的美军陆续撤退。天津这场以爱国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斗争，使中华民族的正气得到申张。对此，党中央发出指示，对天津学生的抗暴斗争作出“成绩甚好、影响甚大”的高度评价。5月4日，天津各大中学校学生在南开大学集会，隆重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迅速在津城展开。北洋大学最先行动，以多种形式广泛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反对内战。5月17日，清华大学传来罢课的消息，北洋立即响应，迅速召开师生大会，成立“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发表《反内战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宣布罢课，开展反内战运动周。转天，平、津、唐等校代表开会，成立“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组织策划华北学界罢课事宜。5月20日，北洋等大中校学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举行“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示威游行。北洋大学组织的1500名学生和南开大学组织的800名学生，举着标语和旗帜，冲过警察设置的重重封锁线，行进到元纬路、罗斯福路（今和平路）上天仙美琪电影院（今人民剧场）和迪化道（今鞍山道）一带时，竟遭到在光天化日之下早就埋伏好的约250余名自称是“平乱会”流氓、特务及国民党军警的追逐、袭击和殴打。当场有6名同学被砖头石块击中前额，昏倒在地，血流不止。10名同学受重伤、67人受轻伤、23人被军警逮捕，酿成震惊天津的“五·二〇”

血案。这次暴力事件，同学们并未被敌人的血腥镇压所吓倒。北洋大学老党员林仁高喊：“同学们，咱们到市政府请愿，营救被捕同学去！”北洋大学重新组织 300 名学生，浩浩荡荡地直奔伪政府大厅，当场撕碎了蒋介石挂像，包围了办公室。陈国雄、洪惠如、程秉元等北洋同学与市长展开 2 个多小时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杜建时理屈辞穷，被迫接受同学代表提出：释放被捕人员、赔偿学生个人损失、惩办军警等条件。并派出 10 余辆卡车护送学生回校，在车上，同学们兴奋地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歌曲。这次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各界群众运动的发展。8 至 9 月，北洋、南大、耀华、广东中学等校，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救济委员会，联合发起反饥饿斗争，利用暑假开展“敬师助学运动”。北洋等 13 所大中学校代表在广西路青年会召开会议，成立“天津市学生助学运动委员会”，号召同学走向街头里巷，以募捐、义卖、义演等方式开展募款自救活动。有一次，教育部长朱家骅来到北洋大学，在校园内被学生围住，向他义卖罐头、毛巾小物件，他被迫捐款 300 万元。仅短短 1 个来月，全市 39 所学校组成 20 多个小分队，出动 2000 多人，共募集资金总额超过计划，达到 36000 万元。这次活动是解放战争时期，津门青年学生运动参加学校最多、发动最广泛、人数最多的一次群众运动。10 月，由“北系”领导的北洋地下党支部正式成立，王武（张振锐）任书记，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11 月，北洋大学获悉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国民党处死狱中的消息后，全校罢课 3 天，为其举行追悼会，并发表《告全国同学书》，要求

为于申冤。12月，正值北洋大学校长和经费“双缺”而陷于停顿的困窘下，唐奇等5名学生代表组成赴南京请愿团，经与反动政府针锋相对的斗争，校长到任，经费到位，师生满意，按期复课。

1948年3月28日，北洋、南大700多名学生赴北大参加学运交流，会上成立华北学联，提出“共生共存，保卫民主”的学生自治会誓词。北平反动当局悍然宣布要查禁取缔华北学联，以此为导火线，华北地区学生掀起反迫害的四月风暴。4月4日，为深入开展反迫害斗争，北洋学生自治会邀请津、唐10余所大中学校的3000名学生来津举行保卫华北学联会议。大会通过决议，给反动当局迫害学联以有力回击。5月30日，平、津、唐12个院校及部分东北学生在北大举行会议，决议成立“华北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北洋大学联络兄弟校进行罢课。这次反美扶日运动，揭露了国民党的卖国面目，沉重打击了美帝扶日的险恶阴谋，扩大了反美反蒋革命统一战线。8月20日，天津反动当局派军警、宪特，对北洋大学的学生实施抓捕，有36名学生被列入逮捕名单，为天津高校中最多的学校。北洋大学党支部书记王武和纪衡也被当局列入的重点通缉对象。王武从解放区回天津的火车上，知道自己被通缉。但他为营救被捕同学，执意奔走于平津两地，直到把每个学生送往解放区。当时，北洋大学建立临时支委会，由书记沈尔琳和委员扬启绍、聂璧初领导学校斗争，党员发展到20余人，保护了学生的人生安全。11月上旬，南京政府密令北洋大学南迁至福建厦门

或江西萍乡，并汇巨款到校，充当诱饵。此事引起北洋师生广泛关注。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经校内反复争论，于12月5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了《不南迁决议》。学校团结教育广大师生，揭露国民党南迁的阴谋诡计，认清其反动本质，公开表态“坚决留校不南迁”。北洋的多名资深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呼吁当局重视古国文化，勿使学校遭受浩劫。谌小岑在香港联络龙云等44名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发表反蒋声明，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陈荃民与18位教授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反对迁校台湾，要求国民党军退出天津，险些遭到逮捕。在反南迁斗争中，北洋大学组织师生上街宣讲党的城市政策，发动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维护了群众情绪，稳定了学校秩序，反南迁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北洋、南大等校牵头联合津门各大、中学校开展的爱国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形成解放战争中党的第二条战线。

六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负隅顽抗，死守天津。北洋大学临近市郊边缘，国军为筑牢“三线”阵地，把北洋大学周边的树木统统砍光，房屋也被全部拆毁，将学校作为对付解放军的前沿阵地；守军在北洋大学的高层建筑物上修筑“强力据点”，派重兵驻扎，严加把守；还将金汤桥、金钢桥、21号路以北包括北洋大学的地域列为军事第一线。1948年底，

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北洋大学地下党组织立即成立“护校应变委员会”，发动师生开展抵御国民党军侵略、反南迁签名，保护校园，迎接解放的活动。在校党支部和张含英校长的支持下，及时有组织地把师生员工转移至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今天津美术学院）进行妥善安置；把学校多年收藏和购置的图书、仪器、设备转移到该校南楼地下室，完整地得以保存；护校应变委员会适时作出决定，扣留南迁经费，改作应变费用，解决了北洋近千名教职员工、学生和家属的吃饭问题。同时，组成师生纠察队，严密守护校舍，开展护校斗争。12月，成立了陈荇民任主席的“北洋大学临时维持委员会”。1949年1月14日，在解放天津攻城之时，北洋大学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主动走出校门，配合解放军散发传单，为进攻中的战士当好向导。不少同学协助军方清理打扫战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15日下午，天津宣告解放。北洋大学同学走街串巷，帮助解放军张贴平津前线司令部制订的《约法八章》和平津卫戍司令部及天津市军管会颁发的《布告》。16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工学院等高校4000多名师生，联合举行盛大游行，与广大市民一起热烈庆祝天津解放。北洋学子们载歌载舞，欢聚一堂，沉浸在欢庆解放的胜利喜悦中，分享着北洋大学这所中华老校，历经漫长、曲折、艰辛、奋斗之路，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获得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作者单位：河西区方志办）

参考资料：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潮书店印行，
1951年4月初版

陈得仁编《天津地下党斗争》1992年10月1版1印

姚维斗、黄真主编《“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6月1版1印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天津历史简明读本》，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11年6月1版1印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光辉的印迹》，天津人民
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1月1版1印

林成、才萱、荣德编《天津人不能不知道》，新蕾出版
社出版，1996年6月1版1印

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河西党
史资料汇编（1924—1949）》，1991年7月1版1印

《今晚报》及网络

不负芳华，巾帼铿锵

——从“圣功女中”到“新华中学”

圣功女中旧址坐落在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99号。占地面积66亩，总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该校原名为圣功女学校，由天主教会夏景如等人于1914年创办，校址在长春道，后迁至滨江道，1929年学校更名为圣功女子中学校，1941年迁址马场道陶园（现马场道99号）。



图为圣功女中师生合影

天津解放前，圣功女中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1937年地下党负责人闫国珍等在该校组织“女同学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学校内成立了“三人小组”，由魏鸿翔（1939届毕业生）

与张启兰（1941届毕业生）负责。她们团结进步学生，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本侵华罪行。1945年，华北城工部刘仁派地下党员秋晨到该校领导学生运动。秋晨原名李健乔，在高一年级读书。她发展刁书芳等人入党，还发展“民青”（天津民主青年联合会）成员。她们冲破教会的阻拦，组织该校学生参加“反甄审”斗争，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1948年，地下党员方纪文接收指示，全家搬入学校，保护档案、校舍，开展护校活动，迎接天津解放。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当年夏天，上级派来了党员干部张文琴与非党干部任鸿泰到校工作。一些地下民青成员和进步学生如刘珥掬、谢宝珍、徐如玉、王文秀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成立了校委会，主任委员德玉珍，吸收进步教师和学生参加。还建立了团的组织，吸收了团员与团友（一些超龄的中青年教师）。

圣功女中的校训是“温、良、恭、俭”。校歌是：蒙以养正推圣功，育德基础在幼冲。坤灵秀气天独钟，勿被流俗误尔聪。伏女传经曹姑续史，懿行古今尊崇。见贤思齐毋多让，莫自持年华尚富。驹光过隙甚匆匆，望勤于始毋怠终。

天津解放后，圣功女中多次易名，1952年12月16日，天津圣功女中改为市立中学，定名为“天津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1956年开始招收男生。1958年随着天津师范学院改为天津师范大学，圣功女中更名为“天津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1960年又随之更名为“河北大学附属中学”。1973年定名为“新华中学”。1978年，被确定为天津首批重点校。



图为新华中学

新华中学的校训：“艰苦必胜”，校风：“严、勤、和、实、新”，教风：“精通业务，教学严谨，热爱学生，为人师表”，学风：“勤奋，多思，活泼，创新”，新华精神：“艰苦奋斗，争创第一”，领导干部作风：“民主求实”。



校徽



图为新华中学圣功楼

（本文根据张绍祖先生提供的相关史料整理编辑而成）

以笔为剑 以墨为锋 以字为刃

——从“志达中学”到“四十一中”

志达中学旧址位于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23号。由张岫溪创办于1933年，校址初设于英租界56号路（今和平区西安道45号）。翌年2月增设天津私立志达小学。1937年初迁移到特一区（今河西区）马场道49号（今123号）。



图为志达中学旧址

志达中学校歌为：荟萃人文渤海之滨，集英才乐育天真。
梗楠作器桃李当春，要裕吾知，修吾德，健吾身。勇朴诚勤，

昭示谆谆，乘时光须日日新，学成致用，希望无垠，是校之光，家之宝，国之珍。

该校师资力量强，善于因材施教。著名学者书法大师津沽大学中文系主任吴玉如曾任该校国文教员。中国树皮结构化学研究的创始人张英伯 1937 年从北平师范大学生物学（主系）与化学（副系）毕业后，曾在该校任教一年。1943—1945 年著名学者吴小如曾在该校任国文教员。被誉为华北数学四大金刚之一的边叔扬曾任该校数学教员。包于轨（1903—1971），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曾任该校国文、读经教员。王福重于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曾任该校化学教员。



图为志达中学高中部第一届毕业女生合影

1944年，志达中学成立自发的学生进步组织——鸣新社，其成员三分之一是志达中学学生。鸣新社自办的刊物——《鸣新》周报，主要内容是隐晦地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也刊登一些如何做人的文章，倡导做一个有道德、不随波逐流的人；还通过诗歌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此外，也刊载过反对封建礼教的文章。周报在当时起了一定的启蒙、鼓动作用。鸣新社的人员也不断发展，前后共有成员20多人，还团结了一些要求进步的学生。

抗战胜利后，志达中学的历届毕业生组织了志达中学校友会，筹办了一所志达平民义务小学。学校不仅给谦德庄等地贫寒子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还宣传爱国思想、革命道理，把这些劳动人民子弟作为开展革命斗争的后备力量。后来学校又办了两个成人班，收的是东亚毛纺厂等工厂的工人。学校教师教得热情，学生学得认真，校风正派，成绩显著，深受谦德庄一带劳动人民欢迎。学生最多时达到200余人。

1945年9月，国民党教育部公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和《收复区中等学校教职工甄审办法》两个文件。声称要通过考试进行甄别审查，不合格的要取消学籍或解聘。这件事激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天津市公立、私立大中学校共30余所，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采取统一行动，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接着组织集会、示威请愿，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志达中学约30人参加了向国民党教育局的请愿，通过反“甄审”斗争，再次锻炼了学生运动骨干，进一步团结了广大师生。日本投降后，天津人民

仍在苦难中挣扎，不少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教师工资微薄，难以糊口。天津“学联”决定，学习上海学生，开展“敬师助学”运动。志达中学学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组织领导者是孙锡九和李正之。

1947年5月20日，志达中学有100余名学生积极响应市学联号召，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

195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接管了私立志达中学，学校改为公立中学并更名为天津市第二十二中学。1955年8月该校高中部师生并入天津市第四十一中学。1978年天津市第二十二中学撤销，全部教学设备和部分教师及全体学生并入四十一中学。2003年，晋升为市级重点中学。2005年，被命名为天津市首批历史名校。



图为天津市第四十一中学外景

学校遵循“诚、勤、勇、朴”的校训，坚持“敬业、竞职、镜己、竞上”的教风和“思想、思问、思恭、思义”的学风。学校先后获得天津市普教系统先进集体、文明学校、实施素质教育“三A”学校、实施《中小学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示范校、艺术教育特色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义务教育示范校、义务教育完成率先进单位、优秀家长学校等称号。



校徽

海河西岸见证风云变幻 百年学府培育国之栋梁

——从“北洋西学学堂二等学堂”到“海河中学”

在今天的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与南京路交口，矗立着一座饱经沧桑的宏伟校园——天津市海河中学。这所发轫于维新运动时期的百年老校，先后经历了北洋西学学堂二等学堂、德华普通中学堂、大营门中学、直隶（河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河北省立天津女子中学、天津市市立女子中学、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最终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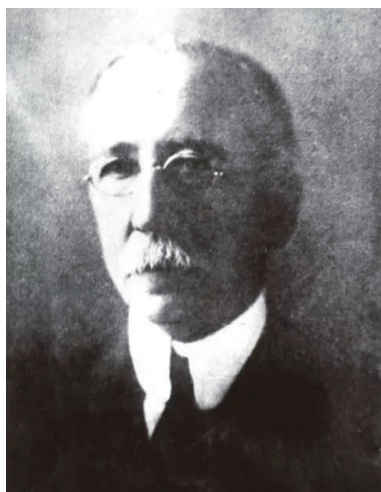


盛宣怀（1844—1916）

名为海河中学，见证了中国公立普通中学教育的发端和发展，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公元1895年5月（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刚刚经历甲午战事失利的光绪皇帝下谕，提出创立新式学堂。是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于9月19日（农历八月初一）通过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向朝廷上奏《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此奏于10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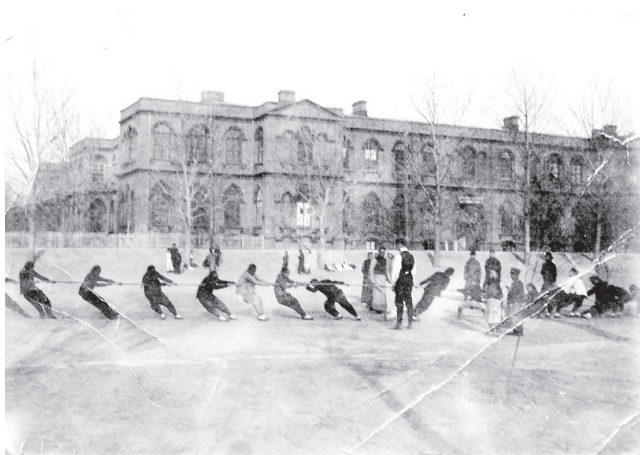
(农历八月十四)经光绪帝朱批准奏。批准之初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首任督办(校长)为盛宣怀，首任总教习为美国教育专家丁家立，初创校址位于大营门外的梁家园博文书院校舍(今解放南路海河中学校址及毗连的解放南园等)。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学堂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学制为范本，内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其中二等学堂为普通



丁家立 (Charles Tenney ,
1857—1930)

中学性质，相当于大学附中，学制四年，招收十三至十五岁、对四书五经有一定了解并具备一定写作能力的学生。该校主要课程包括英文、数学、各国史鉴、地輿学、格物学等，考试“汉文不作八股试帖，专作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其开创了我国、我市公立中学先河。该校校园后因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先后被美军、德军占领，被迫迁址重建。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德国人在北洋西学学堂原址德国兵营内建立天津德华普通中学校。该校是德国政府组织下的一所商办学校，初办时只是为了解决德租界内侨民子女的上学问题，后扩招了一批14至20岁的高小毕业或能作300字以上汉文的中国男学生，以及部分来津的朝鲜籍学生。1912年(民国元年)，遵照民国政府教育部法令，天津德华普通中学堂更名为天津德华普通中学校。1918年(民国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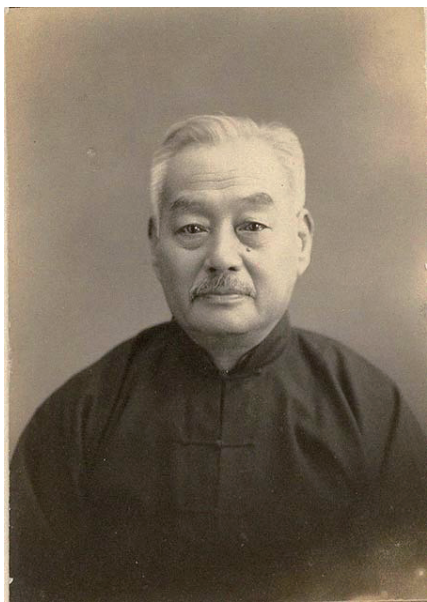
清末，天津德华普通中学堂学生进行拔河比赛

德国战败后，北洋政府当局不再允许德方办学，学校停办。该校虽仅有12年办学历史，但是将西方现代先进教育体制、理念和方法以及大批仪器

设备引进天津，为天津近现代中等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9年（民国八年）1月7日，中方正式接管学校，将学校改组为大营门中学，由津门教育界著名人士李金藻出任校长。该校于1924年停办。

1924年（民国十三年）4月，北洋政府直隶省教育厅以省内一向无女子中学为由，利用停办的大营门中学旧址，借用拟在大营门中学建美术学校的经费，创设“直隶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拟定“朴毅敬诚”为校



李金藻（1871—1948）

训，每年经费五千元整。首任校长步子方，训育主任步以，教务主任刘泽山，于是年10月10日开学上课。1927年（民

国十六年)7月,校长步子方前往保定河北省教育厅任职,任命步以 为第二任校长。1928年(民国十七年)6月,因直隶省改称河北省,校名改为“河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并成立校图书馆。1929年(民国十八年)秋,学生增至6个班级,高中



步以誠(1888—1970)

部、初中部各3个班级,共6个年级。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10月,学校奉令更名为“河北省立天津女子中学”,共有9个班,学生270余人、教职员20余人。初中设国文、算学、化学、物理、历史、地理、植物、动物、劳作、体育、卫生、图画、音乐等科目,高中增设立体几何、三角、解析几何、大代数、生物、伦理等科。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日寇占领天津,步以 拒绝了日伪政府的聘请,辞去校长职务。抗战胜利后,李淑敏出任该校校长。至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该校有15个教学班、642名学生、45名教职员、20间教室。

天津解放后,学校于1949年2月被天津军管会文教部接收,成立校务委员会,时任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教育处副处长唐棣华兼任校长。是年8月,学校被天津市政府接收,定名为“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10月,唐棣华校长奉调离任,董劲秋接任校长。

1953 年该校被确定为天津市 10 所重点中学之一，直属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局，面向全市招生。50 年代先后有 30 名学生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是当时天津市唯一具有此项殊荣的学校。



今天的海河中学

1968 年，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开始男女生兼收，又因学校濒临海河，故更名为“海河中学”至今。1978 年划归河西区教育局管理，1979 年被天津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天津市首批重点学校。2021 年被确定为天津市首批品牌高中培育学校。

该校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大营门中学办学时期，1919 年（民国八年），“五四”运动爆发，是年 5 月 23 日，该校与其他 14 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 1 万多人举行罢课，要求

北洋政府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释放北京被捕学生。省立女中时期，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一二·九”运动中，该校许多同学参加了天津市声援“一二·九”运动的“一二·一六”大游行。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天津沦陷后，在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先锋队的领导下，学生积极参加抵制日货、反对日本教官、抵制奴化教育的斗争。1938年（民国



王正廷（1882—1961）

二十七年）学校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学校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是“学生成绩好、守纪律、生活朴素”的好学校，也是当时党的力量最强、参加人数最多、学运搞得最活跃的学校之一。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该校正式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解放战争时期，该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下设总务股、学术研究股、体育股、联络股、风纪股、游艺股、合作社，统一领导全校的各种活动。学生自治会会刊《一二一》，共出版了三期。在中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该校学生投入了反甄审、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迎接解放等一系列斗争，成为天津市学生运动中一支骨干队伍。

从“北洋西学学堂二等学堂”到“海河中学”，百年风雨征程，学校作为教育宝地、兴学沃土，桃李天下，人才辈出。



陈茹玉（1919—2012）

百年来，学校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涌现出了中国奥运之父、著名外交家王正廷，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李邦翰，中科院院士、著名化学家陈茹玉等杰出人才。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心理健康教育特色校、生命教育先进校、天津市中小学依法治校示范校，思想政治教育先进校、师德建设先进校等荣誉称号。

面向新时代，海河中学在传承百年兴学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秉承“朴毅敬诚”的校训，坚持“全面推进生命教育为学生终身幸福奠基”的办学理念，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现代化高品质学校”，培养“内外兼修、身心两健、品格坚毅、合作创新的优秀海河学子”，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学校领先优势，使海河中学成为师生生活的家园、求知的学园、成长的乐园。



海河中学校徽

（根据张绍组先生提供的相关史料及海河中学相关资料综合整理）

马三立，男，回族，1914年10月1日生，2003年2月11日逝世，曾就读天津汇文中学，相声表演大师。代表作有《吃元宵》《卖挂票》《黄鹤楼》《相面》《文章会》《逗你玩》等。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擅演“贯口”和文哏段子。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



潜心探索，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马派相声”。是当时相声界年龄最长、辈分最高、资历最老、造诣最深的“相声泰斗”，深受社会各界及广大观众的热爱与尊敬。^{（1）}

言传身教铸家训，躬身示范践初心

王文振

作为相声表演大师，马三立不仅在相声领域有深厚的造诣，在家风传承上，也对自己及子孙后代有着严格的要求，他的勤勉作派、以身垂范的良好品格都为子孙树立了榜样，成为了“马式”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勤俭的父亲马三立

老年人都是比较勤俭节约的，这和他们过苦日子有关。但是对于马志良来讲，父亲的勤俭犹甚。

有一次，马志良为了让父亲穿上舒服的皮鞋，特意买了双软牛皮软底儿的皮鞋给父亲穿。马老知道儿子孝顺，也很高兴，拿过皮鞋便穿在脚上，在屋里走了几步说，“真舒服，多少钱呀？”马志良知道父亲切入了主题，只好怯生生地回答，“三百多吧。”父亲一下子愣住了，之后气呼呼地说，“太贵了，我不穿。”马志良知道拗不过父亲，只好一双新鞋“便宜”了自己。于是，马志良“吃一堑长一智”，再买东西就不再买那么贵的了。马三立这种勤俭持家的家风深深影响着马志良。⁽²⁾

勤奋的父亲马三立

在马志良眼里，父亲对相声是挚爱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有关相声的问题，由此马志良变得非常地勤奋。

在马三立老人 87 岁高龄的时候，他还每天在纸上默写相声段子《10 点钟开始》，他对马志良说，“我得锻炼我的记忆力，像这些长段子不能生疏了。”一次马志良从父亲的遗物中找出了那本厚厚的文稿《10 点钟开始》，马志良说，睹物思人，看着那工整的字迹，一字不漏的内容，又想起父亲对相声的那份执著和努力。

马志良说，父亲回家很少说话，他总在默默地想事情。有时马志良怕父亲有心事，就问他想什么。父亲说，想着今天演出的



时候为什么有个“包袱”没抖响，也许把那两个字放在后面要好一些。

马志良说，父亲总是这样，为了一个小“包袱”都会不思茶饭，直到下次演出变换方式获得成功之后才会满意。往往这时，他会一改对人的谦和态度，变得“斤斤计较”，变得“睚眦必报”。这种勤勉的家风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马志良。⁽³⁾

严苛的爷爷马三立

说到马三立，我们对他的作品都非常熟悉，但如果说到家风，就有不为人知的一部分，但是一个家的家风，真的会影响到一代人，马三立对子孙有三条严格的规矩：

第一就是不允许孩子，尤其是孙子称大辈。因为相声行当里有辈分的规矩，马三立相声辈分高，大家都喊他老祖，如果他的孙子也在相声圈里面撑大辈，那就是不允许的。马三立的孙子，马小川跟他一起住，他特别钟爱这一个孙子，

但如果是来说相声的，不管他们喊马三立什么，马小川都得喊人家大爷、叔叔。

第二条规矩是如果大人来了，孩子不允许插嘴，



在旁边问三问四是不行的。大人说大人的话，孩子可以在旁边听着，但不能插话，这也是一种基本的礼貌。

第三条规矩是在外面不许耍贫嘴，不许油嘴滑舌。马三立从未打过孙子，但有一次他就亲自动手把孙子马小川给打了，当时马小川岁数小，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在下面“砸挂”。结果老师把他留下了，说他要贫嘴，马三立知道以后，亲自揍了他，而且揍的还特别狠。马三立的本意是自己的祖辈，都是说相声的，说相声家的孩子在外面油嘴滑舌，不是马家的家风。

除了这三条严格的规矩之外，马三立还言传身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自己的后人。马三立常说：“我老了，不能演出了，国家还管我，要是在旧社会，这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咱要感恩社会，回报社会，多做力所能及的公益事业，你要跟我一起去受教育。”晚年时他经常带着孙子马小川到监狱和劳教所帮扶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而且去了以后不让媒体宣传，不吃饭，不接受纪念品，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也

能体现马三立的家国情怀。他的良好家风也成就了马小川。⁽⁴⁾

参考文献:(1)引自《天津河西历史文化名人传略》54页;

(2)、(3)引自北方网:马志良追忆:我的父亲马三立 一个耿直的父亲 <http://ent.enorth.com.cn/system/2003/02/18/000509433.shtml>;

(4)引自搜狐网:马三立“管教”马小川 https://yule.sohu.com/a/530695484_571524。

(河西区档案馆)

敏学不倦 日新有恒

——从“天然小学”到“上海道小学”

上海道小学是以道路命名的，查遍百度你会发现，天津没有称呼“上海道”名称的道路。实际上，从1973年开始，上海道这条路名就消失了，且现在的上海道小学经过搬迁也远离了原上海道的位置。历史上的上海道为原墙子河南岸的道路，从小白楼地铁站（原平安桥的位置）至海河梁家园水闸这条路，称为“上海道”。1970年，天津市政府利用墙子河河道修建中国距地表最浅的地铁，时称“7047工程”，1973年填埋墙子河，将南京路与上海道合建成通衢大道，命名为



上海道小学校园（1988）

胜利路，1984 年复名统称南京路。这样，自 1973 年起上海道的地名，在天津就消失了。



上海道小学外景

上海道小学前身是一所教会小学即天然小学，系一贯道教会于天津解放前创办，原校址在南昌路 8 号，即现今的图书大厦和建行大厦所在位置，南京路与大沽南路交口西南侧。解放后，1950 年，天然小学更名为六区第一小学，校址迁至上海道理门公所三义庙内。1953 年六区三十一小学并入。1956 年，六区第一小学改名为河西区上海道小学，由爱新觉罗·溥佐题字。1960 年蚌埠道小学并入，作为该校分校。1968 年大营门街民办小学（始建于 1958 年）并入河西区上海道小学。1979 年上海道小学迁至广东路新校舍。2000 年佟楼小学并入上海道小学。佟楼小学校舍拆除，在原佟楼小学校

址建上海道小学新校舍，于 2001 年建成。

目前河西區上海道小学共 5 个校区分别为：隆昌路计算机职专校区、南楼校区、广东路校区、荔湾路峰汇广场校区、友谊路总校。该校学习环境良好，教育教学设施齐全、先进，学生在这里可以享受到优质教育。

学校秉承“求新绽活，自主发展”的办学理念，弘扬“敢为人先，活力无限”的学校精神；恪守“敏学不倦，日新有恒”的校训；树立“创新相伴，快乐相随”的校风；践行“博学求新，善导启智”的教风；培养“乐学养慧，善思致用”的学风，追求形成“自主发展，以乐育乐，和谐共进”的办学特色。



上海道小学校徽

上海道小学有一支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20 世纪 60 年代该校开展了学习黑山镇山关小学的“黑山经验”，并以此为突破口进行集中识字教学改革实验，自编教材，改革教法，提高了学生的识字效率，吸引着全国各地教育工作者来校听课、观摩，取得一定成果，后被定位学习“黑山经验”市级实验校，学校知名度逐步扩大。1969 年由教师张金珍创试“笔珠结合”实验。指导思想是：“以笔为主、以珠促笔、笔珠结合、相辅相承”。相继编写了一整

套教材、教法参考书。1970 年在全区推广，1972 年全市推广。随后在全国推广，试验形成高潮。

十二个“名师工作室”的成立，充分发挥名优教师在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师资培养等方面示范、指导、引领和辐射作用，以专业引领、实践探索、真诚合作，共同发展为工作宗旨，开启上小名师接续传承新篇章。一路走来，多个学科团队获得天津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并推荐参评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奖，多位教师获得区级、市级优秀班主任称号，多位教师获得全国优质课大赛、天津市双优课比赛一等奖。学校先后与本市多所高校合作共建，引领课堂更高效、更实效。学校坚持以科研为引领，以自主创新为目标，以课程改革为核心，以优化教育内容为载体，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师生的自主发展。



上海道小学学生体育课合影

上海道小学被评为天津市“三A”学校、天津市素质教育示范校、天津市文明学校、天津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天津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天津市依法治校先进校、天津市教育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师德建设先进单位、天津市绿色学校等，涌现出一批全国模范教师、天津市师德先进个人典型，培养出全国十佳少年、津门童星近二十人。此外，学校曾被评为首届全国文明校园、全国德育实验名校、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科技活动先进单位、全国中小学教学改革金钥匙奖、全国平安校园、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示范岗、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



上海道小学教师开展现场教学

上海道小学是一所老牌重点小学，师资力量雄厚，学校以素质教育著称，各种活动很多，比如艺术团、各种课外兴趣社团等。“机器人”作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特色科技活动和校本课程，在历届全国大赛中，多次获得冠军，学校获中国“机器人”竞赛优秀学校。

目前，上海道小学正朝着教师队伍精良化、学生发展个性化、学校课程多样化、学校管理科学化、学校特色品牌化的目标而努力奋进。

（本文根据河西文史资料选辑及张绍祖先生提供的相关史料整理）

赓续红色血脉 讲好河西故事

——贺《微志书》第十期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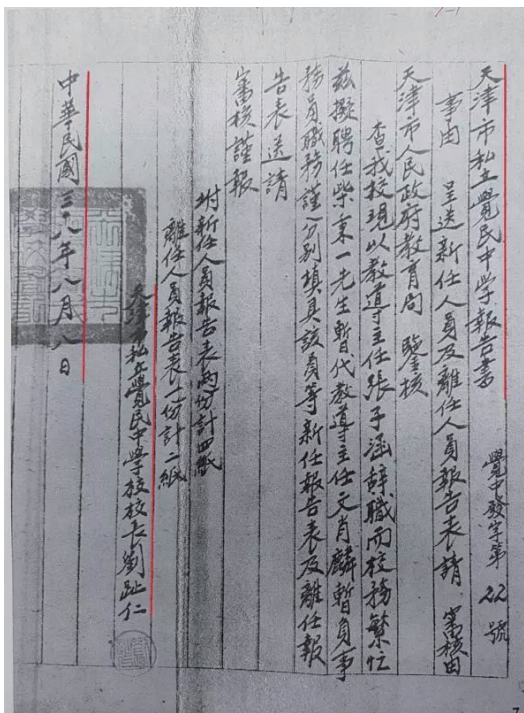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今天《微志书》第十期上新了。为更好地记录河西区发展历程，让更多人了解河西、热爱河西，充分发挥志书“存史、育人、资政”的重要作用，天津市河西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推出“微志书”版块，通过天津市河西区档案馆微信公众号为大家介绍河西区历史，讲好河西故事，传承河西文脉，传递河西声音，为讲好天津故事、中国故事贡献河西力量。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穿越历史长河，感受河西历史的厚重。

滋兰树蕙 赓续华章 勤学自立 成才报国

——从“天津私立觉民学校”到“天津四中”

天津市第四中学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津门名校，是天津解放后建设的第一所公立完全中学。现校址位于河西区澧水道1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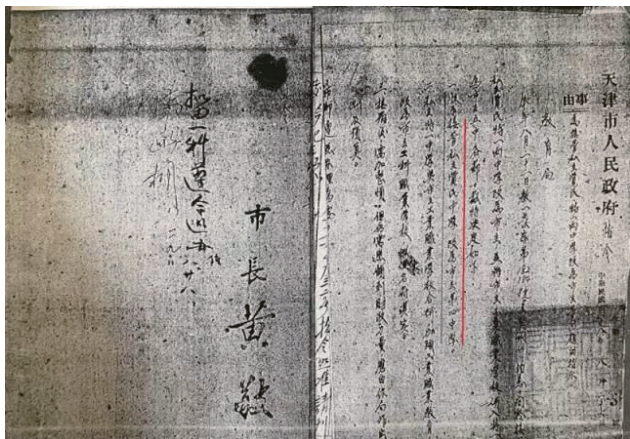
天津四中的前身是天津私立觉民学校。据《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记载，“觉民学校初创于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初设）高小一班，初小一班，校址在黄纬路（今河北区昆纬路东四经路至东六经路之间的海军昭忠祠旧址），校务则由创办诸公共同管理。及民国二年（1913年），方推王鸿敏校长，民国四年（1915年），始成立中学，（民国）七年（1918年）在（直隶省）教厅立案批准，



1949年8月8日，时任私立觉民学校校长刘趾仁呈送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关于新任人员及离任人员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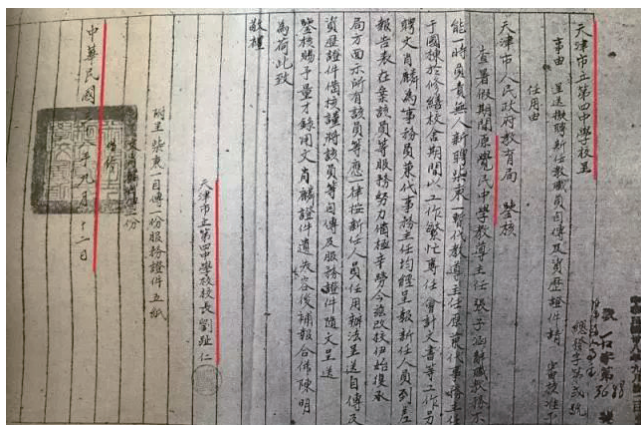
(民国)十七年(1928年)迁移中山公园内(今为河北区少年官),……(民国)十八年(1929年)复成立校董会,重行立案。”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的隆隆炮火刚刚平息,红旗插遍津沽大地,正当天津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时,天津市人民政府便牵挂着人民的教育问题,于1949年8月决定将天津私立觉民学校



1949年8月22日,时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黄敬同志对私立觉民学校改建为市立第四中学的批示

改建为市立第四中学。天津市首任市长黄敬同志批示:“尊令



1949年9月12日,天津市立第四中学校长刘趾仁呈送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关于新聘任教职工简历和相关资质证书的文件

迅办”。自此第四中学正式挂牌招生,成为解放后天津市人民政府建立的第一所中学,原觉民学校校长刘趾仁继续担任第四中学校长。1951年6月,天津市立第四中

学由河北区迁入新址(河西区隆昌路爱德里),时任教育部部长、书法家马叙伦亲题校名。1954年,将市第二十三中学



1950年7月,天津市立第四中学第一届毕业生及全体教职员合影

(原私立慈泽中学)高中部并入,50年代四中是河北省重点中学,时任校长王锐民。1960年6月,因教育结构调整,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师生步出四中校门

为天津市仪表工业学校,1961年6月恢复为天津市第四中学。1995年恢复为天津市重点中学,2001年成为首批国家级示范性高中,2018年8月学校迁入河西区澧水道11号新校址,2021年成为天津市首批品牌高中建设项目培育学校。

作为百年老校，四中始终传承红色的文化基因。早在觉民学校建校时，就专门招收辛亥革命牺牲的烈士子弟；“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师生抗日热情高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刘趾仁、许汝骧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觉民师生坚持同国民党反动



1950年12月，被批准参军入伍参加抗美援朝的四中学生的合影

派进行斗争，直至1949年天津解放；1950年，成立伊始的四中学子踊跃报名参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1989年9月，四中共支部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994



天津市第四中学校徽

年被中共天津市委授予“天津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称号。该校以“校风正、学风浓、质量高、有特色”闻名遐迩。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校、文化立校、科研兴校，让学生在四中受到最好的教育，让家长满意。四中的办学

理念是走出了一条具有四中特色的现代化学校建设之路，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1980年学校首倡“五美”教育相继被《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报道与转载；1986年，学校发挥党建优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想解扣”活动，这一举措被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学司作为经验转发全国；1994年学校号召全体教师以高尚师德回报社会，面向全市举办“免费辅导班”，四中教师们利用休息日为来自全市的学生义务补课，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天津市教育局授予四中“敬业爱生奉献，以高尚师德回报社会”先进集体称号；《人民教育》《天津日报》曾以《解读“四中”现象》《四中启示录》等为题，多次头版、整版报道学校优质的教育教学经验以及成果。

四中注重以文化建设引领学校发展，以“三风一训”建设为抓手，以形成和谐向上的集体价值取向和群体行为风尚的目标。努力加强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层面的文化建设，通过召开干部骨干研讨班、基层组织建设研讨会、年级文化建设现场会、班级文化建设交流会，统一思想，深化认识，以各种活动为载体，扎实推进学校文化建设。通过学校文化建设引导教职工增强事业心、责任心、进取心和对学生的爱心，弘扬四中精神，浓厚四中情结，形成了积极向上、求真务实、创新争先、和谐共进的良好氛围。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全国科研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科技活动先进校、首批全国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优秀示范校、全国机器人竞赛先进校等荣誉称号，并连续5次荣膺天津市基础教育最高奖项——



今天的天津四中校园

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作为百年老校，面向未来，四中将持续秉承“勤学、自立、成才、报国”的校训，弘扬“仁爱、正直、勤奋、坚韧”的四中精神，融合团队智慧、丰富特色课程、追求品质提升，努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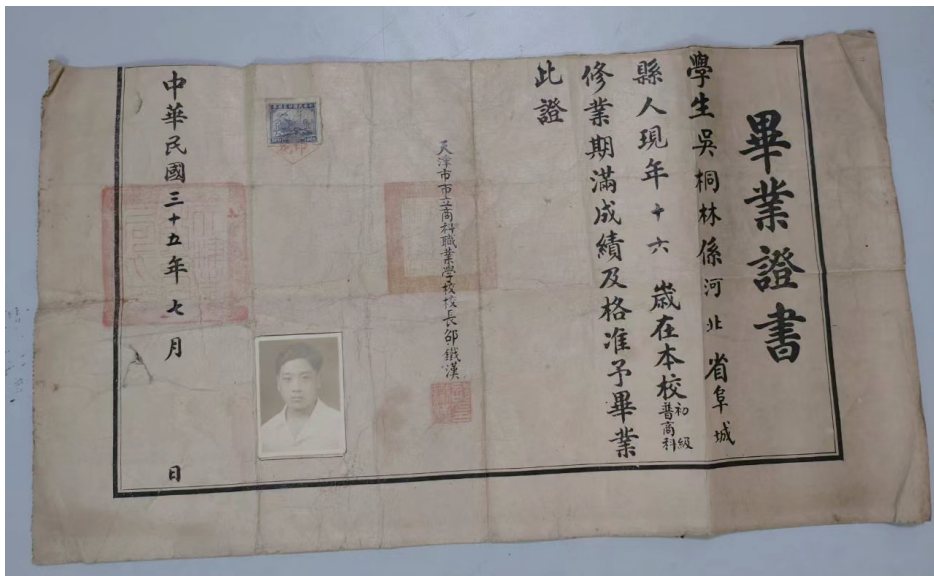
（本文根据《河西文史资料选编》及天津四中相关校史资料综合整理）

尚勤致精 经世济民

——从“市立商职”到“财经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建于1958年，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五所财经院校之一，目前校本部设在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25号，校分部设在河西区马场道123号。

天津财经大学溯源于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成立的天津特别立市商科职业学校（简称市立商职）。市立商职于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秋筹建，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7月招生。首任校长为王义森（字炳书）。校址最初暂借位于新开河畔志成道的市立师范学校南院（原“省师”旧址）。1943年（民国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天津市立商科职业学校毕业证

三十二年)春,由董亦儒继任校长。市府将位于河北区月纬路的市府原址(今二中初中部南院对过)拨给市立商职作校舍。迁入新校舍后,对原有房舍进行了改造,设礼堂、办公室和教师休息室,扩充了原有打字教室。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暑假后开设会计学、成本会计(工业用)、公司会计(商业用)、统计会计、政府会计等课程。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6月,董亦儒辞去校长职务,由原教务主任穆瑾如继任,主持校务。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1月,市教育局任命邵铁汉(字刚如)为校长,校名改为天津市立商科职业学校后,师资更加可观。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的邵铁汉、王运新、王世瀛,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乔友忠,毕业与辅仁大学的钱君晔,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陈东生、王世濂,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的郭春圃、杨世杰,毕业于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的徐维藩等,均为该校教师。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教育界享有很高声誉。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1月,天津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市立商职,市教育局派邓伯明任副校长,主持校务。1950年1月,市政府决定市立商职改称为“天津市立财经学校”(简称财校),由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耕涛兼任校长,军代表丁峰为副校长。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学以致用原则,学校将原有课



李耕涛(1913—1974)

程予以适当增删调整、分别开设理论课（经济学等），政策课（财经政策等），技术课（统计、会计等）三部分。学科分为会计、统计、贸易、工厂管理等四科。



1950 年天津市立财经学校毕业证

需要，拨市立二中旧校址为分校校址。1952 年该校迁至河西区徽州道 2 号（原天津工业学校校址，今海河中学徽州道校区）。在院校调整中，市政府决定将始建于 1937 年的私立众成商业职业学校和始建于 1906 年的私立育才职业学校并入天津市立财经学校。

1958 年 8 月 18 日，天津市财经学校在与南开大学经济系部门经济各专业、天津对外贸易干部学校合并的基础上成立河北财经学院。建院初期，院址分设两处：一为河西区徽州道 2 号，一为和平区河北路 209 号（原民国总统黎元洪旧居，后天津对外贸易干部学校校址，今河北路 219 号）。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图书约 5 万册。鲁林、丁峰等 9 人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由鲁林、丁峰负责。1959 年 3 月，河北省人民委员会规定，学院业务主管部门为河北省财政厅，任命河北省副

省长王金山兼任院长，鲁林为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丁峰为副院长，鲁林、丁峰实际主持学院党政工作。1965年9月13日，学院正式迁到河西区灰堆新院址，即今珠江道25号现址。1969年10月1日，根据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冀革（69）130号、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津革（69）168号文件，将河北财经学院划归天津市领导，随即更名为天津财经学院。1970年底，在“文化大革命”否定文科大学和裁并高等院校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天津财经学院一度被降格为中专体制。1974年6月4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天津财经学院。1987年，市政府决定将河西区马场道123号（原22中旧址）拨给天津财经学院，作为分院校址。1991年，天津财经学院被确定为天津市属重点大学。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天津财经大学。



今天的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建校初期，以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经济理论研究人才和财经院校师资人才为主，设贸易经济、财政金融、会计、工业经济、计划、统计、外贸经济等专业及专修科。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财经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该校及时调整专业结构，高度重视学科建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同类院校中率先开设国际金融、国际会计、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税收、涉外审计、跨国公司等一批社会急需的涉外经济专业和专业方向，取得先行优势和整体优势。

该校经过6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已成为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科为主干，兼有文学、法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等多学科门类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也是天津市属重点大学和我国北方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基地。



天津财经大学校徽

该校拥有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9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5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具备培养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完整教育体系，形成包括普通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留学生教育以及从业资格培训等在内的层次齐全、形式多样的人才培养序列。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9个，国家级特色专业5个。校园占地近1400亩，全日制在校

生 16000 余人。现有教职工 1232 人，其中副高级以上职称教师 326 人，研究生导师 474 人。学校现任党委书记、校长刘金兰。

该校以“培养顺应时代要求、具有可持续发展潜质的人才”为目标，不断强化“教学质量是学校生命线”的教学理念，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教学方针，尤其重视应用学科教学，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在教育部首批本科教学评估中取得优秀成绩。学生在全国、全市各类竞赛中屡获佳绩，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6% 以上。该校大力实施“科研兴校”方针和“科研精品”战略，积极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成果优势，尤其在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科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的科研成果，为服务天津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该校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与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余所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科学研究、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合作关系。

天津财经大学发展到今天，是几代人为之努力奋斗的结果，其中许多成果卓著的学者、专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建校初期即由南开大学调入的李宝震教授、杨曾武教授则是其



李宝震（1916—1993）

中的杰出代表。享有卓著声誉的资深专家教授还有：余新民、王亘坚、管锦康、周逸江、陈寿琦、马作舟、姜绪门、赵禹辰、李建昌、刘儒、肖嘉魁、张英元、刘伯午、庞慎勤、郝颢桓、陈国武、于玉林、岳曙耕、陈克式、鹿立江、康钟琦、周恒彤、肖红叶等。

该校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始终秉承“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理念，弘扬“不息为体、尚勤致精、日新为道、经世济民”的天财精神，踔厉奋发，作育英才，积极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优良的文化传统和严谨的校风学风。展望未来，学校将坚持提高质量、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的发展原则，全面推进“新财经”建设，着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

（本文根据河西文史资料选辑及张绍祖先生提供的相关史料整理）

传承百年师范教育 孕育基础教育文脉

——从“天津市立师范”到“天津师范大学”

河西区是天津市近现代百年师范教育文脉的发祥地之一，今天的天津师范大学是河西区近现代师范教育的见证者、传承者和代表。她主要由两个前身组成，一个是成立于1958年的天津师范学院，另一个则是始建于1930年的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天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前身）。近百年来，从饱经沧桑的“市立师范”到焕然一新的“师范大学”，学校为天津乃至全国输送大批基础教育名家和核心骨干师资，为天津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优质师资人才支撑。

1958年，为了适应天津市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中共天津市委、市人委决定组建天津师范学院。同年9月10日，天津师范学院正式成立^①，行政上隶属于天津市教育局。郭沫若同志曾为天津师范学院题写院名。天津师范学院初建之时设置了数理系、史地系、生化系、中文系共计四个系，四系之下又设置了七个学科。建院之初，学院确立了“培养为基

^① 1952年，国家高校院系调整，原津沽大学师范学院扩建为天津师范学院，1958年夏，河北省教育厅将学校扩建为“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夏，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原天津师范大学改建为综合性大学——河北大学。此阶段的天津师范学院和天津师范大学系河北省属高校，与本文介绍的现在的天津师范大学没有直接关联，需加以区分以免混淆。——笔者注

基础教育服务的合格师资”的办学定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为了满足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方面面干部和人才、为



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教学楼

中学提供优质师资的需要，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教育部同意，学院于1982年6月14日正式更名为天津师范大学。经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1992年8月21日，南开大学分校更名为天津师范大学应用文科学院，1996年8月30日，天津师范大学应用文科学院并入天津师范大学。至1998年，学校共有博士点4个，硕士点25个。为适应天津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要求，进一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对本市高等师范教育实施结构性调整，将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天津教育学院进行合并，组建新的天津师范大学。1999年4月8日，新天津师范大学宣告成立，天津市的百年师范教育开启了崭新篇章。

天津市立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市师”）成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8月，校址在河东特二区三马路西头海河沿（原河



1949年天津市立师范学校毕业班师生合影

北区海河东路天津市第二十六中学校址)，首任校长时子周。该校以培养本市小学师资为目的。除设师

范本科外，还依据地方需要附设师范本科职业班、完全师范科、义务师范科、初级中学班。还办过小学教师进修班、教育学班、图书馆学班和讲经班。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市师”停办。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2月伪天津市教育局将学校更名为“天津特别市立师范学校”，并复校。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河北省立天津师范学校、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师范部并入该校。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恢复天津市立师范学校，邓庆澜任校长，校址迁至下瓦房大沽南路。至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该校有8个班、399名学生、35名教职员。天津解放后，市军管会文教部接管学校，校名改为“天津市师范学校”。“文革”期间，学校停办。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扩建为天津师范专科学校。1996年4月，更名为天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99年4月，经市委、市政府研究、教育部同意，将天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天津师范大学、天津教育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天津师范大学，同时撤销天津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制。

时至今日，全新的天津师范大学共设有 2 个学部，20 个学院，开设 75 个本科专业；有 7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1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 个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33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6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学校于 2021 年入列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优质师范大学建设行



天津师范大学八里台校区大门

列、2023 年进入教育部与天津市政府共建学校行列。目前，天津师范大学共有八里台、西青两个校区，其中八里台老校区坐落于天津市河西区吴家窑大街，西青新校区于 2005 年 9 月投入使用。

从“天津市立师范”到“天津师范大学”，学校的发展变迁、成长历史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师范人始终秉持崇高的爱国情操和严谨的治学风格，为天津和国家的教育事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市立师范”时期，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学校积极提倡抗日救亡教育，与南开中学成为天津市两个实行抗日教育

的营垒。学校还组织“社会观察团”，带领学生主动接触社会。解放战争时期，学校有地下党员、地下民青，曾组织读书会——野草社，积极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反美军暴行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师范学院时期，学院党委积极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改革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注重科学研究。自天津师范学院更名为天津师范大学后，学校进行教学建制的调整，建立了校－院－系三级机构二级管理体制。90年代初，学校创造性提出“德育一体化”育人机制，为培养德才兼备的基础教育师资人才、服务我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1999 年“三校合并”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焕然一新的天津师范大学审时度势，实现了三大转变，即由

桃李争妍

天津师范大学校歌

1=C 4/4

万卯义 词
万卯展 曲

6 — 5 . 3 | 1 — — — | 2 . 1 7 6 5 | 6 — — — |

5 6 1 6 5 3 | 2 3 1 2 . 3 | 5 . 6 3 5 2 | 1 — — — |

1 — 5 . 6 | 3 2 3 1 — | 1 7 1 2 1 | 5 — — — |

学 海 浩 瀚 涛 飞 浪 卷

6 . 7 1 7 6 | 5 3 6 — | 5 5 5 6 3 1 | 2 — — — |

我 辈 高 扬 征 帆 我 辈 高 扬 征 帆

3 . 3 5 3 | 2 2 3 1 6 . | 1 . 2 3 6 | 5 3 2 1 5 . |

惜 时 如 金 阅 环 宇 经 典 国 材 施 教 育 强 国 俊 彦

6 — 5 . 3 | 1 — — — | 2 . 1 7 6 5 | 6 — — — |

创 新 业 政 尖 端

5 — 6 . 1 | 6 5 5 3 2 — | 5 . 6 3 5 2 | 1 — — — |

桃 李 争 妍 桃 李 争 妍

6 6 5 . 3 | 1 — — — | 2 . 1 7 6 5 | 6 — — — |

神 州 大 任 担 在 肩

1 1 2 3 1 | 2 1 7 6 — | 5 6 1 3 2 | 1 — — — |

挽 华 夏 儿 女 共 建 明 天 共 建 明 天

5 . 3 2 1 6 | 3 — 2 — | 1 — — — | 1 — — 0 |

共 建 明 天

天津师范大学校歌

传统师范教育向现代教师教育转变，由以教学为主向教学科研并举转变，由功能单一的师范院校向以教师教育为主体的综合性师范大学转变。2000年，学校明确了提出建设国内一流师范大学的目标和任务。

2004年，学校确立了将该校建设成为“教师教



天津师范大学校徽

育特色的教学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总体发展定位。

桃李争妍担复兴重任，因材施教教育强国俊彦。传承津门百年师范教育，今天的天津师范大学始终践行“勤奋严谨，自树树人”的校训，确立为基础教育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方向，遵循“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按照“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的育人标准，正在向“培养人才高质量，科研成果高水平，办学条件高标准，国内外高声誉”的目标奋进，努力创建教师教育特色的教学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百年传承历久弥新 以人为本自强不息

——从“北洋女医学堂”到“天津医专”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天津医专”）具有百年办学历史，目前坐落于河西区柳林路14号。



北洋女医学堂大门

公元1908年8月（清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中国第一所公办护士职业学校——北洋女医学堂成立。彼时，西学在中国兴起，女学和妇女解放运动一道蓬勃发展。天津女子职业教育，以护理职业教育为开端。是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赴京赴任军机大臣前，奏请清政府以库银2万两，在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督办下，由长芦盐运司创办女医学堂，附设在我国首个国办妇女儿童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天津公立女医局内，校址位于天津老城厢东门外水阁大街。我国第一位女留学生、著名医学家金韵梅（又名金雅梅）女士担任堂长（校长）兼总教习，聘请

公元1908年8月（清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中国第一所公办护士职业学校——北洋女医学堂成立。彼时，西学在中国兴起，女学和妇女解放运动一道蓬勃发展。天津女子职业教育，以护理职业教育为开端。是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赴京赴任军机大臣前，奏请清政府以库银2万



金韵梅（1864—1934）

英国著名医师卫淑贞女士任实习教习；聘请我国早期护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的钟茂芳女士任看护教习。以钟茂芳翻译的《牛



1914 年钟茂芳（中间戴燕帽者）出席护士大会时的合影

津护理学手册》为教材，是西方护理学传入中国最早的教科书之一。钟氏学术功底深厚，在 1914 年出席中华护士大会第一届会议时当选唯一的华人副理事长。会上经她提议，将英文“Nurse”的汉语翻译由“看护”改为“护士”，含有“保护、养育”之意，诠释了职业女性的高雅与尊严，表示了护士职业的文明与高尚，受到与会者一致认同，至此“护士”一词在我国沿用至今，长达一个多世纪。

随着时代变幻、政局动荡，北洋女医学堂遭遇重重困难。1912 年（民国元年），北洋女医学堂归属中华民国北洋政府。1914 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直隶省署停拨经费，学堂停办。

1915 年（民国四年），北洋女医学堂经北洋政府批准，同意复校，体制改为官商合办。复校改制伊始，由我国近代著



严范孙（1860—1929）与张伯苓（1876—1951）

名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先生等人组成校董会，推举长芦盐运使汪世元为董事长（汪世元于1916年卸任长芦盐运使职务，不再担任学校董事长，学校董事长由张伯苓

接任）。学校每月由官府出资700元，余由各校董分担，校名改称“天津女医局附设护士助产学校”。该校维持到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官款终止，学校改为董事会下的私立校。经民国政府天津市教育局护士教育专门委员会审核，改称私立天津女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49年，天津解放，学校由天津军管会接管，1950年交由人民政府天津市公共卫生局接办。

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城区共有11余所护士助产学校，这些学校为近代天津乃至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护理学专业技术人才，见证了津门职业护理技术教育的源起和发展。除前述“北洋女医学堂”外，其他10所护士助产学校包括公立校3所，分别为天津特别市市立医院附属女子助产看护学校、天津市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卫生部天津中央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私立校4所，分别为天津市私立达生女子助产学校、

私立丽云护士学校、天津私立志生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天津私立天和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教会校3所，分别为天津美以美会妇婴医院护士学校、马大夫纪念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天津私立仁爱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天津解放后，在市公共卫生局的统筹协调下，以上11所护士、助产学校中，除天津特别市市立医院附属女子助产看护学校最终改名为天津市护士学校继续保留，达生、丽云解放前早已停办，志生并归市立助产学校，其余7所学校均在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分别并入到天津市护士学校。

1998年，天津市护士学校与天津市职工医学院合并，重组改制为全日制医学高等学校。2002年3月，经教育部同意、天津市批准，改组为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今天的天津医专

2005年学校由和平区鞍山道迁至河西区柳林路14号（“天津第二疗养院”旧址），百年天津护理职业教育最终落户河西。

从“北洋女医学堂”到“天津医专”，学校始终秉持着“以人为本，自强不息，求索进取，共创未来”的办学精神，“严

谨 求实 创新 奉献”
的校训，以及“谦诚
包容、团结奉献、责
任共担、荣誉共享”
的价值观。学校为我
国职业护理事业培养
了大量的技术人才，
如我市南丁格尔奖获



关小瑛（1928—2021）

得者陈路得、关小瑛、王桂英、梅玉文等，为天津医学护理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校徽

我市医学护理教育已走过百年风雨征程。站在百年历史积淀的基础上，面向新时代的天津医专将朝着“建成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卫生职业人才培养、培训基地”目标，以“传承文化、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办人民满意的卫生职业教育”为使命，不断向前迈进、开拓创新。

文以明道 健以利身

——从“天津民立第三十九小学堂”到“河西区土城小学”

河西区土城小学始建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前身为天津民立第三十九小学堂，是河西区近代初等教育的发端、天津市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小学之一。目前坐落于河西区大沽南路935号。



图2



图3

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刻本《津門保甲圖說》（图1）关于土城村（图2红圈处）及村内药王庙（图3红圈处）的记载

今天的“土城”泛指大沽南路与解放南路交会处东侧一带。旧时，土城原名“土城村”。明天启年间（1621—1627）的《天津卫屯垦条款》地图中有土城村，说明此时土城已成村落。清光绪年间（1875—1908）的《津门杂记》谓土城为“土塍”，“塍”与“城”同音，是指田间的土埂或界路。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津门保甲图说》记载：“土城村倚河（海河）面道（海大道，今大沽南路），民居颇夥（读作“伙”），村外有小道，南界后尖山庄。”清末的土城村，北界连贺家口，西界通尖山庄，东界连宣家楼，村内有药王庙，村西北有砖瓦窑。

清末废科举、兴新学，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在土城村药王庙建了一所学堂。该学堂系土城村首户刘香久的家塾，后改为土城村唯一的私塾，村内儿童均可入塾就读。初改为新式学堂时称天津民立第三十九小学堂，只有初级班。1912年（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学校按照新式小学校的建制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办学规模日益扩大。1914年（民国三年）添设高级班，1921年（民国十年）又设女子小学部，分为二校，单独设立。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土城短期小学并入该校。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改为区立土城第一小学（为男校，在裕泰街）和区立土城第二小学（为女校，在土城学堂胡同1号，为复式班）。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5月，该校改为市立第八十七小学，男女合校，前女校改为分校。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8月，改为六区第二十九保国民学校，校址在土城村裕泰街11号，校长田凤翔。当时该校有8个班，414名学生，13名教职员。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该校有

8 个班，435 名学生，13 名教职员，8 间教室，校址在土城村庙前街 25 号，校长仍为田凤翔。

天津解放后，于 1949 年春，区划由保改为街，改名为六区二十九街小学。

同年 10 月，更名为六区第七小学。

同年私立怀德小学

并入该校；1950

年私立振华小学并

入两个班。该校当

时分男女校，是复

式班短期小学。同

年，由土城女学堂



今天的土城小学

胡同 1 号和后尖山村小庙两处小分校合迁到土城刘家巷大院，

成为该校的正式分校（1973 年改为第六幼儿园）。1956 年 1

月六区改称河西区，六区第七小学更名为河西区土城小学，

有 24 个教学班，1000 多名学生，57 名教职工。1960 年有 29

个教学班，1500 多名学生，64 名教职工。1975 年学校左侧

原橡胶厂厂房划归该校为校办工厂。1987 年时，该校舍占地

612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975.31 平方米，有 16 个班，662 名

学生，46 名教师，17 名职工，17 间教室。1996 年 8 月，河

西区春阳小学并入该校；2004 年，陈塘庄小学并入土城小学。

2021 年，土城小学有教职工 87 人，学生 1400 人，36 个教学

班。学校占地 1.4 万平方米，拥有 1 万余平方米的人造草皮

球场和两幢 7826 平方米教学楼。2022 年，坐落于河西区尖山路 46 号的土城小学尖山校区启用。

该校为“足球传统学校”，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早在解放前，学校所在地土城村药王庙前有一块空地，空地旁有个



1992 年土城小学足球队参加全国小学生第二届“双星杯”足球邀请赛参赛队员合影

大水坑，每逢庙会时，土城村内的足球爱好者都会在此处进行一场足球比赛，久而久之，这片空地就成为了一块简易足球场。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

解放初。20 世纪 50 年代，学校师生填平了大水坑，扩大了场地，还在四周筑起了一人高的简易篱笆，新足球场由此诞生。1959 年，市师毕业生蔡德新来校任体育教师，他把土城村娃娃自发组织的“飞龙”和“飞虎”二队合并为土城小学第一支足球队。1982 年，该校被天津市命名为足球传统项目学校。班有班队，年级有年级队，校有校队。该校队在团中央、教育部、国家体委联合举办的“一九八三年全国市、县小学基层代表队小足球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上世纪 90 年代，校足球队代表天津多次出访日本、美国，进行友谊比赛。1996 年，学校

获得天津市足球重点校的称号。1997年9月8日，河西区教委为了发挥土城小学足球运动的优势，在土城小学班底上成立了土城青少年足球学校。该校实行九年一贯制，面向天津市及华北地区招生。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校校队队员先后有几十名成为国家、省、市足球队成员。他们中有天津青年队教练沈福儒，河北队队长“重炮手”张大山，国家队队长“坦克”左树声，国家队“电摩托”翟良田，天津队“拼命三郎”左树起，天



著名足球运动员、教练员左树声

津一队“二嘎子”左树发等。迄今该校向各级各类运动队以及体校共输送了100多名足球队员，被体育界誉为“足球健儿的摇篮”。为土城小学足球队立下汗马功劳的总教练王朝建曾荣获全国优秀体育教师“福来奖”，多次获得全国优秀业余足球教练员的殊荣。

近年来，学校坚持“文以明道、健以利身”的办学理念，践行校训“勤奋、文明、健美、守纪”，努力打造儒雅的教师团队、致雅的学子风范和文体气息浓厚的学校文化，并将“能拼善搏、勤学苦练、团结奉献、精湛技艺”足球精神融入学校教育，突出“足球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办学特色，普及小足球运



土城小学校徽

动，发展足球校本课程。学校先后被命名为全区小学唯一一所“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首批“天津市九年义务教育示范校”、“天津市双高普九达标校”、“现代化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示范校”，2019年被教育部命名为“优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从一座以“药王庙”为校舍的小学到如今拥有优质教学设施、完善管理制度、鲜明办学特色的现代化校园，土城小学不断与时俱进，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坚持“五育融合”发展方向，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培育接班人。

（本文根据河西文史资料选辑、张绍祖先生捐献的相关史料、《河西融媒》关于土城小学的相关报道及土城小学的相关资料综合整理）

尖山南围堤河——解放天津攻城突破口遗址

王儒臣

天津战役是我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次重要的攻坚战，天津东南部尖山南围堤河（俗称护城河，今名复兴河）攻城突破口战斗仅是天津战役的一部分。1949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发起总攻到全歼驻扎在尖山一带的国民党守军，打开南部一条攻打天津的通路，仅用了20几个小时，为解放天津赢得了时间。这次尖山南围堤河战斗，在解放军攻坚战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大型革命历史丛书《星火燎原》，以“鏖战城垣”为题，记述了南围堤河战斗的壮烈场景，震撼人心，令人难忘。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天津战役胜利70周年，弘扬革命传统，传播红色文化，笔者依据河西区二轮（1979—2010年）区志记载有关当年国民党守军在天津南部的城防部署；解放军向天津南线之敌发起攻坚战，打开入城突破口；以及解放后市区人民政府在尖山一带立碑纪念革命英烈等情况，一并整理于此，以飨广大读者。

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连连获胜，国

民党军心惶惶。地处天津东南部的尖山地带，为当年国民党守军的城防线，也是国民党军队南部城防的所在地。1947年，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抵御解放军解放天津，迟迟不肯放下武器，大搞所谓“大天津堡垒化”城防工事构筑，大有固若金汤之势。守军在天津南部设置了两道防御阵地。其中，沿复兴门、土城、陈塘庄、前后尖山、黑牛城的南围堤河一线为重要的防御阵地。

国民党军依据天津城北高南低的地势特点，在防御线上大作文章，并以水做屏障，利用兴建于清代光绪34年即1908年的一条老河道——南围堤河，继续加深加宽，挖掘了深3米、宽10米的城防河道。河西境内的南围堤河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环绕天津全城43千米城防河工程的一部分。敌军守城部队机关算尽，不时关闭护城河陈塘庄等处入海河的水闸，割断其入海通道，使护城河的水位增至3米深。

在护城河北岸内沿的大片农田菜地，国民党守军筑起一道6米高的土墙，墙上架设了纵横交错的铁丝网和电网。在河岸边用钢筋混凝土修了炮楼和许多明暗碉堡的地堡群，每间隔一段就建造一个碉堡，另辅设有子母碉堡……国民党守军在前沿阵地部署的各种坚固的防御设施，盘根错节，部署严密，险阻重重。至今，仅在南围堤河即复兴河北岸的郁江公园内，仍残留着3个涂着迷彩图案、设施较完备的大碉堡，成了解放天津城的历史见证。

护城河的外沿地势低洼，遍布沼泽，是成片荒凉的苇子地。国民党守军在这里深挖了数条壕沟，堑壕外敷架有通着电流

的5道密集铁丝网。还四处堆满鹿砦，埋下宽40米的地雷区。为防备解放军从津郊南部突袭，国民党守军特地利用村庄众多的砖瓦窑、白灰窑烧制的原材料，在灰堆、尖山一带大兴土木，修筑工事，陈兵设防。并集中数万兵力，组成集团防御，形成一个在东南城防高度独立的防守区，企图以深沟高垒、雷区电网长期进行固守顽抗。

二

1949年1月14日，解放天津战役打响后，根据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制定的“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割后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在总指挥刘亚楼的号令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对国民党城防南部防线发起总攻。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46军（9纵）政委李中权指挥了天津南线的作战。由46军137师、49军145师受命担任主力。137师为右翼，在36门山野炮、重迫击炮和7辆装甲车的配合下，在前尖山南围堤河（尖山桥西侧100米处，此桥已拆除）以东地段实施突破。145师为左翼，在24门山野炮的支援下，向尖山村南围堤河以西地段实施突破。在炮火支援下，46军138师从灰堆向上河圈、陈塘庄方向，159师从纪庄子向八里台方向发起佯攻，并占领部分阵地。

14日4时，各主攻团，即137师409团、145师433团等分别进入阵地。137师409团3营、1营为突击营，提前于13日夜12时到达第一道堑壕指定阵地，与团前线指挥所相

邻。409 团政委皋峰和副团长巩玉然担任指挥。8 时，佯攻方向，即灰堆和纪庄子方向的部队开始动作。9 时 40 分，正面炮火打响，46 军 137 师、159 师主力部队以强大的炮火向驻扎在前尖山南护城河东西两侧的国民党防线发起强攻。顿时，浓烟火光笼罩了整个城防。经过 40 分钟对敌猛烈轰炸，145 师从前尖山以西山东义地和小王庄之间实施突破，突破口两侧的敌军据点被大部摧毁。由于 137 师攻城部队从尖山、纪庄子实施突破时受到地形的限制，炮兵阵地距敌人目标较远，西北风又把左翼方向的烟雾吹来，几经攻击未将敌人堡垒彻底摧毁。经周密调整部署，加大对敌城防工事实施破坏性打击力度，终于压制住了敌军地堡群的强大火力。10 时 40 分，137 师 409 团发起攻势，组织 3 营和 1 营的 30 名战士，在敌人炮火连续不断的袭击下，抬着用苇子编织的草垫子长梯桥，直插南围堤河城防。敌人用大量燃烧弹向 9 连战士袭来，大梯子桥被烧毁。409 团 3 营的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战士又连续架桥未获成功，伤亡不小。在这关键时刻，409 团突击营营长刘树森，见架桥不成，决定向前冲击，组织实施爆破。3 营尖刀 7 连的战士沿着战友流下鲜血的路，向敌人占据的南围堤河河岸碉堡冲了上去。

下午 13 时 20 分，137 师组织火力掩护，409 团突击营进行冲击。7 连 1 排（尖刀排）1 班班长吕树华举起“登城先锋”红旗，在 3 排长宋宝林的率领下，尖刀班以勇猛敏捷的动作渡过护城河，跃出堑壕，钻过铁丝网，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冲向突破口。敌人的子弹象雨点般地袭来，班长吕树华中弹

倒下，壮烈牺牲。战士于米福接过红旗，冒着敌军三面火力的夹击，迅速前行，当他越过第二道铁丝网时突然被挂倒。副班长罗开云抢上前去，接过红旗，箭步向前方冲去，在通过南围堤河时，一梭子子弹向罗班长射来，罗班长腿部负伤倒在血泊中，仍端着步枪对准敌人射击。于米福再次接过红旗，扶起罗班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奋不顾身地扑向城防敌军碉堡，连续甩进3颗手榴弹，碉堡里的3名敌人全被消灭。

13时32分，于米福高举红旗和3排长宋宝林率领的19名战士，从尖山南围堤河以东地段登上城垣，把红旗插在了突破口。409团战士们看着突破口被打开，“登城先锋”红旗在城垣上空高高飘扬，个个欢呼雀跃。13时35分，145师官兵在南围堤河以西地段也打开突破口。此时，137师409团3营7连2排6班班长郑文英，率领3名战士冲向城垣，连续炸开敌两道铁丝网，快速越过护城河。当接近城垣的一处碉堡时，火速向地堡里的敌人猛烈射击，箭步从两个枪眼内塞进手榴弹和炸药包，当场歼敌10余人，占据了城垣突破口，把第二面红旗插上了城头。国民党守敌趁409团立足未稳，又从三面卷土扑来，3营7连及后续的8连、9连的战士们，在一粒饭一滴水未进食的情况下，冒着刺骨的寒风与敌军展开鏖战，先后打退敌人的10余次反扑，给敌军以大量杀伤，夺回了阵地。409团2连一直战斗到全连只剩下20余人，仍然以血肉之躯坚守着胜利的阵地，为友军部队的纵深战斗打开了通路。14时许，后续部队及邻线友军陆续插入。第46军所属各部队乘胜追击，在土城、黑牛城等地与敌军反复争夺。

阵地，致使南线敌军的防御体系被彻底捣毁。

从13日夜12时409团3营进入阵地起，至15日4时，46军将士经过2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胜利攻克了天津南线的国民党城防，有420余名解放军战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这里牺牲或受伤，鲜血染红了城垣河床。

三

为纪念人民解放军攻破津南国民党军城防的重大胜利，天津市和河西区两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平津战役所形成的战争遗址和纪念地的开发利用，每年组织各界人士来到尖山南围堤河——解放天津攻城突破口遗址，祭奠革命烈士，讲述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让人们永远铭记为了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

199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河西区人民政府尖山街道办事处和天津铁路分局西站陈塘庄车站（今复兴河北岸）在车站花园内联合修建了解放天津攻城突破口纪念亭和纪念碑，以告慰为解放天津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后因车站部分设施拆迁，2002年9月，在复兴河疏浚改造工程中，河西区人民政府在五号堤路与郁江道交口处建造了解放天津攻城突破口纪念碑，纪念革命烈士们的英雄壮举。2009年5月，该突破口遗址被天津市委、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8年，因复兴河兴建桥墩，五号堤路北延，市、区有关部门将此纪念碑向左侧原样移动了将近200米，就是现今坐落

在郁江道与市建筑工程学校交口处，濒临绿道公园、复兴河畔的攻城突破口纪念地。

“解放天津攻城突破口纪念碑”是分东西并列矗立的两座7米高的宏伟建筑。整个纪念地占地面积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均由花岗岩和大理石铺设而成，地面上雕刻带有攻城方向箭头及“平津”字样的图案标识，它象征着天津战役是平津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碑主体结构有若干形状各异的石块雕塑而成，东西两部分浑然一体，西侧碑体下部底座上镌刻“解放天津突破口纪念碑”10个大字，东侧碑头从上至下依次镌刻“一九四九年”“一月”“14”这个重要日期及天津市人民政府立“解放天津突破口纪念碑记”，它寓意广大人民群众永远铭记天津解放这一喜庆日子，纪念革命烈士的英雄壮举，牢记人民军队的丰功伟绩。两通碑体身上均分布着深度不同的“炮弹”痕迹及数架用钢铁铸成且断裂了的道道索链，它见证了解放军第46军官兵，突破国民党守军的严密封锁，冒着枪林弹雨从这里打开进入城区的突破口（注：据百年风云丛书《沽上春秋》记载：天津攻城部队从东、西、南部三个方向，共打开11个突破口，尖山南围堤河突破口为其中的一个），与敌军展开激烈巷战，一举解放了天津城。

（河西地方志办公室提供）

一纸诠释“资料性著述”的人大精品

王儒臣

2020年，是天津市河西区人大常委会设立40周年纪念日。在这一难忘的日子里，笔者认真阅读了前不久由河西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纂、北京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河西区志·人大编（1979—2010年）》。联系多年从事人大工作的实践，深切地感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权组织形式，既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集中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集中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与愿望，是最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

“人大编”的编修，从始至终致力于突出“资料文献性著述”这一特点。通篇文字，客观、真实、全景式地记录了河西区人大常委会自1980年设立以来，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依法履行职权，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政权建设，全面实施法律监督、工作监督的实践活动和发展历程。不仅蕴含、留住了各届人大常委会及其室、委工作人员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发展，在开拓中创新，长期坚持不懈所获得的劳动成果，而且为河西区扩大改革开放，促进全区政治、经济、社会等

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堪谓一部专业性强、质量较高的志苑范本。

一、下真功夫，广采博集

志书是资料文献性著述。搜集资料乃志稿编纂的重中之重，且要贯穿始终。

我区编辑“人大编”，历经3次拟定提纲目录、3次进行资料采集的过程。2009年，区政府启动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随之，区人大选定人员，开始筹备“人大编”的资料征集和编辑工作。当时，按区地志办的要求，先拉了个提纲，经领导同意后，正式付诸实施。用半年时间，翻阅了1980至2008年共20多年人大工作的各类文件资料。重点参考了《河西人大二十年》一书；第一轮《河西区志·政权篇》；历年人大工作年鉴；人大财经、城建、教科文卫、内务司法各专业工作委员会的调研报告；建立代表统一活动日制度；全国有关报刊杂志刊载我区人大工作的文章；以及在全国部分城区人大理论研讨会上的经验材料等。经深入挖掘素材，形成初稿，以电子版形式保存，成为首次资料搜集。2010年，区人大研究室以此稿为基础，进行第二次资料搜集与编辑。把重点放在有关人大代表的产生、构成；历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工作机构、重要会议；以及人大监督检查、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等方面的内容。这一阶段仍然以资料征集为突破口，对初稿进行反复甄别，充

实精华，纠正错讹，修饰润色，取得较好效果，形成第二稿，按时书面送交区地志办。第三次资料征集是在2013年9月至2015年间。当时，区地方志办公室有修志编辑7人，其中区政府聘请区人大退休干部4人。为高标准高质量地修好“人大编”，经编辑们严格审阅，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将人大上报的材料返回单位，抽出专人，继续加以完善，形成第三稿。3次资料搜集工作，各尽其能，各有侧重，相辅相成，体现了众手成稿、特别是人大退休人员和在职干部共同书写志稿的优势和特点。

三易其稿基本完成后，原在人大工作过的几位编辑，勿忘初心与使命，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敬业担当的精神，分头把关，对“人大编”再度修改。在二轮修志市里对河西区进行初审前的关键阶段，又深入区人大机关，翻阅核查文件、搜集口碑资料、选择不同时期的老照片、核实各种会议时间及人员名单图表等，倾注心血，费尽不少辛苦。区志编辑部还多次专题讨论审议，确保“人大编”的质量。

二、认真推敲，拾遗补缺

志书是信史。对入志资料真实性的要求很高，倘若资料的真实性不准、不实、打了折扣，就会使后人读起来起疑生畏，不敢引用，从而降低志书资政辅治、存史教化的功能。因此，在编修“人大编”的过程中，对资料的反复推敲、考证就显得十分重要，注重把好“三关”：

一是，资料分类关。史海钩沉，冗杂繁复。把搜罗到的浩瀚资料，经过仔细筛选、斟酌、锁定，合并同类项，按照编撰志书特殊体例的要求，以“篇、章、节、目”架构进行分类。也就是把“人大编”分成：“人大代表、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重点工作”4章。章下再分出节，如“第四章”分“监督检查、决定重大事项、人事任免、代表工作、调研交流、议案建议督办、信访处理”7个节。每个节之下再分出若干目。考证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上，通过统盘设计、严密考证、科学归类，既减少了内容重复的现象，亦遴选出最佳素材，提高了考证分类的精准度。

二是，事实核准关。历届人大代表的普选、构成等，多涉及代表的姓名、身份、年龄、文化程度、民族、任职时间等成千上万个项目或要素。对这些永久性保存、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务求逐一核准事实，来不得半点马虎，以防出现讹误，酿成“硬伤”。

三是，拾遗补缺关。志稿的质量优劣与否，不在于文字的长短。“人大编”定稿虽仅有30000余字，正是由于在核实考证中，果断放弃拿不准的材料，增补完善缺项内容，避免文字叙述带感情色彩，以及年代、时间重复或存有断代的现象，方使得志稿内容翔实，脉络清晰，详略得当，“成色”不少，解决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难题。

三、精雕细琢，科学打磨

资料著述即志稿编纂，是在搜集素料与考证的基础上深加工的过程。“人大编”经过“众手成稿”与“总纂（专家）编修”，整合谋篇、精雕细琢，科学打磨而形成。总纂尤如工匠“打链串珠”，以严谨、细致、专注、负责的态度和精于文、匠于心、品于行的理念，将一根五彩的链，把千万颗珍珠串连起来，打造成精品。

诸如，河西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恢复后，注重以探索、强化“三权”创新为着力点，将人大工作的创新成果逐步转化为常委会的决策：在决定权上补“短板”。按照区委统一部署，进入21世纪前夕，人大常委会对涉及政治、经济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即全区中长期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方案、重点经济项目、依法治区等事项深入调研，界定审议和决定重点工作的范围，并适时作出《关于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暂行决定（试行）》，使“第一权”逐步纳入规范化轨道。在监督权上动“实招”。全面推行“一府两院”部门执法责任制，对全区各执法部门实施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面对面执法评议，推动各项法律法规的落实。在任免权上，把监督权与任免权融为一体。对人大任命的干部，任前、任中、任后均作出规定，提出具体严格的纪律要求，形成较为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1999年，河西区人大常委会实施“三权”，推进全区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法，在天津市区县人大是

首次尝试。再如，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统一活动日、代表执法检查、议案建议督办等项工作，经过多年的探讨与实践，都具有各自的长项和优势，且凸显河西特色。

志书的总纂稿人独具匠心，通过辛勤耕笔，将数年积累的人大工作基本经验，特别是颇具地方性特色的工作整合起来，详近略远，述而不作（论），浓墨重彩，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文字不枝不蔓，语言朴实严谨，成为新的亮点，从而提升了“人大编”的质量与品位。

在天津市对河西区志稿初审与终审评议中，该志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志指导处领导和同行的一致好评。

（作者单位：河西区地志办 王儒臣）

河西梁家园是北洋大学的发祥地

王儒臣

大约形成于明代天启年间之后的梁家园村（即梁家庄村，或称梁园），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天津的版图上业已消失。然而长期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的这方地名，如今则成了鲜为人知的风韵故事了。殊不知，在梁家园这块沃土上，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底蕴，曾建有梁家园博文书院、梁家园北洋西学学堂、梁家园营门外俄文新馆、梁家园孟兰会、梁家园跑马场、梁家园营门、梁家园排水节制闸、梁家园炮台等一些本土文化或中西方文化相融合的生活服务设施，并承载着诸多过往的历史述说与记忆。时下看来，诞生于天津河西梁家园，有着辉煌经历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洋西学学堂（即北洋大学堂），就是当年兴学强国的典范和培养造就大学人才的摇篮。

梁家园村亦称梁家庄村。其地理位置，据《天津县新志》记载，在明清两代，梁家园村是静海县大直沽里海河两岸的一个村庄，大体指今河西区大沽南路与浦口道南京路交口金皇大厦及东北部邻近地区。民间传说“先有梁家园，后有大

营门”之说。实际上大营门建于清代咸丰十年（1860），原本是天津著名的濠墙营门之一，落于津城东南部的梁家园村附近。“东南梁家园”就指今大营门，梁家园的范围与大营门差不多，面积约 0.19 平方公里。

据《津门杂记》载：“咸丰十年（1860），清统兵大臣僧格林沁，在津筑建濠墙，深沟高垒，距城三里至五六里不等，营门凡十一，围长共三十六里，人称墙子。”当时，环绕天津城垣挖筑了一道护城土濠墙，墙中间设置了 11 个“营门”，其中在梁家园村设一营门，即梁园营门。为封锁海河，防御敌船入侵，在濠墙与海河交会处修筑了 2 座炮台，河西岸有梁家园炮台（今南京路东口北端），河东岸有行宫炮台，统称之濠墙炮台。后清政府再次加固津城围墙，深挖壕沟。《天津政俗沿革记》记述，光绪七年（1881）七月，为增强天津的军事防御能力，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盐运使如山，第三次对津城濠墙和各个营门进行重修，由原来的 11 个营门增至 14 个，称濠墙之门为营门。最初各营门并没有正式名字，大营门按坐落位置俗称“梁园营门”。后来，各营门名称由盐运使如山题署时，才将梁园营门正式命名为“凝晖门”，俗称大营门。梁园营门是通向海大道（今大沽南路）的出入口，海大道穿营门而过，故把海大道上这座营门称谓“大营门”，成了清朝末年天津的一处城防重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德国效尤英法美日等国在天津设立租界地，并与清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允许其设立租界。于是梁家园村一带沦为德国兵营，

德军在梁园田间放养马匹、储存军粮及武器弹药，并驱赶梁家园村和靳庄子、小王庄的村民迁徙到德租界以西地区居住（即原海大道以西、墙子河以南），“三村合一”形成“三义庄”。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毁墙拆门，遗迹无几，只留下一条墙子河（今南京路）。就连设在海河西岸的梁家园北洋西学学堂校舍也成了八国联军的司令部、德国兵营。

原先在梁家园的地界内，有一处兴建于1912年的电动启闭式排水节制闸，它位于今南京路与台儿庄路交会处。这座闻世107年的闸口，至今运行良好，仍担负着街道里巷往海河的排水任务。在河西区的地名图上，现存以梁家园命名的老地名，仅剩一个“梁园闸”了。

二

天津近代大学堂的建立，始于维新运动时期。北洋大学堂的兴办，不仅推动了我国首个近代学制的产生，而且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深化起了典型示范的作用。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战后，清政府为汲取战争教训，光绪皇帝发出《强国诏》，向朝野征求“自强、求治”之策，寻求变法维新，许多有识之士认知救国之道应从改良教育入手。1895年5月，维新派代表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废科举，兴学校”。在“兴学强国、科教救国、

实业兴邦”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是年9月，擅长洋务实业的洋务派代表、晚清巨贾、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适应当时国家工业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的需求，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教育救国图存思想。盛宣怀呈请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转奏朝廷，“拟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亦即筹建一所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大学堂，作为之后各地开办大学的模式和范本，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是年10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光绪皇帝在奏折上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获准立案承办。由天津海关、电报局、招商局等单位出资，盛宣怀在博文书院旧址创办了“北洋西学学堂”，又称“中西学堂”。这样，中国近代第一座新型大学在天津正式诞生。校址选在大营门外梁家园村邻近的海河西岸一带，属现今的河西区地域。四至大体为：东临海河之滨的台儿庄路，西迄解放南路，南界绍兴道，北抵南京路；包括现在的海河中学北门至南门、解放南园和毗连的天津公馆、港建里、海运里居民区及部分单位用地。

直隶总督王文韶主持了大学堂开学典礼。清廷重臣盛宣怀首任学堂督办即名义校长；聘请美籍著名教育学家丁家立为首任总教习，统掌总理学堂校务；委派候选道伍廷芳为头等学堂总办。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盛宣怀面对“非常之世”，走出了一条艰难办高校的“非常之路”，从而确立了他这位“非常之人”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开拓者的历史地位，进而达到中国延续长达千年的封建教育的历史宣告结束，开创了中国近

代高等教育先河的“非常之目标”。

该校创办第二年，奉令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命名为“大学堂”的高等学校。初创时，按照盛宣怀撰《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的规划，头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盛宣怀与丁家立商榷，兴办新式大学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的办学模式为蓝本，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在教学计划、教科书选择、功课设置、教员配备、讲授内容与方法上，全面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的课程与美国大学相近，所聘教习多为国外学者。如，化学教习、美籍博士福拉尔，曾与爱因斯坦过往甚密，且对相对论颇有研究。在学制上，设置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相当于大学附中，学制各为4年。头等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分法律、机械制造和动力、土木建筑水利、采矿冶金4个学门，开设40来门课程，分基础课和专业课。生源面向社会，从香港、天津、广东、上海等地招考。二等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公立普通中学，设英语、数学、地輿学、各国史鉴、格物学等20多门课程。在这些专业中，既有社会科学学科，又有自然科学学科。水利机器学、机器工程学、材料热力学、机器房演示等课程是中国工程教育史上的首创。1897年增设铁路专科，附设铁路学堂。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北洋大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批自己的大学毕业生。到1900年，共有200余名学生如期毕业，原拟派赴国外留学，后因八国联军入侵，暂搁浅。1901年，兼任“留美学堂监督”的丁家立，亲自带领陈锦涛、王宠惠、张又巡、王宠佑、

严一、胡栋朝、陆耀廷、吴桂龄等首批 8 名（均为广东籍学子）毕业生赴美国留学深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这是天津最早派出留学生的学校之一。

王宠惠（1881 — 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生于香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从小受祖上的熏陶，攻读孔孟等儒家经典。先后在港圣保罗学校、皇仁书院读书，成绩优异。1895 年，他从香港考入天津梁家园北洋中西学堂头等学堂法科专业，为第四班同学。1900 年 1 月（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校方正式颁发给他由朝廷认可的“钦字第一号”大学考凭，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自己本土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也是近代中国首张大学毕业文凭的获得者。1901 年，王宠惠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之后，旋即英国研读国际公法，赴法、德等西欧国家考察宪法。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用英文翻译并出版了原德文作品《德国民法典》，这一英译版本奠定了他在西方世界的学术地位，很快编入欧美大学的通用教材，赢得国际法学界好评。1911 年（宣统三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出任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抗战期间，任外交部长等多项要职，为争取外援、抗击日寇做出了贡献。他在法学各领域有着精深的造诣，提出诸多前瞻性的理论观点，为民国第一法律家和中国法学的奠基者。曾是首个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的中国法学家，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人之一。

三

中国第一所综合性新式大学的创建与发展，虽与时俱进，前无古人，盛极近代，但在清政府封建统治和殖民者的列强侵略之下，却几经沧桑，屡遭磨难，尤其饱受战争颠沛流离之苦，走出一条既曲折坎坷、又艰辛辉煌的办学之路。

1895 年底，北洋西学学堂校址所在地梁家园划归德国租界。1900 年，英法等八国联军入侵津京后，大学堂在劫难逃。校园先是被美军占领，教学中断，旋由德军入驻，校舍地被沦为德军兵营和医院，连接军司令部也设在校园。面对这种战乱恐怖的形势，大学堂的教学设施和文书教案损毁殆尽，人心涣散，被迫停办。为继续留在梁家园复校，大学堂的实际掌校人、美籍学者丁家立亲自赴柏林与德政府进行商谈。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北洋二等学堂总办蔡绍基等校领导，多次与德国占领军交涉，然德军拒不归还，只得另辟校舍。

1902 年 8 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接管天津，清政府恢复对天津管辖主权。鉴于梁家园大学堂被德军占领，不得不选择坐落于天津城北八里的西沽村北武库（又称西局，为北洋军火贮存地）旧址，即遭英国海军破坏的武库废墟上重新建校。由蔡绍基执掌大学堂总办（总理全校事务），主持重建复校事宜。当时，市井百业凋敝，金融崩溃。蔡绍基倾注大量心血，克服重重困难，从海关库存银筹措复校经费数

十万两，并组织力量清理武库战争废墟，因陋就简，精心规划，建成教学大楼、中外教员楼、校务办公用房及学生宿舍等基本设施。整个建筑占地 348 亩，规模宏伟，校园宽阔，蔚为津沽名胜，正如《北洋校歌》所言：“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1903 年 4 月 27 日，北洋大学堂起死回生，从海河西岸的梁家园迁至北运河河畔的西沽武库（今西沽公园与河北工业大学红桥校区东院一带），正式复校开课，蔡绍基为校方总理，丁家立续任总教习。开始学制采纳日本建议，改为正科及预备班各 3 年（法科正科 4 年、工科 3 年），机械班停办。1904 年，直隶高等学堂按二等学堂之制改为 4 年，定为天津大学堂的预备学堂，毕业生不经过入学考试可直接升入大学堂。

1905 年，袁世凯更改校名为“北洋大学”，人们称之为“龙牌大学”，百姓惯称“西沽大学”“武库大学”。设立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工程等 3 个学门、10 多个科目，学制为 4 年。1906 年，主管大学堂达 11 年之久，3 次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教育勋章，为北洋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历史性突出贡献的丁家立辞职，全校师生拟《送丁公嘉立序》，表达敬仰之情。蔡绍基出任大学督办，王劭廉任教务提调，蔡儒楷为监督。在校新老班子交替之际，集中进行校务整顿，成果丰硕，校风大变，正式开启中国人自主主持大学教务的新时代。复校后，在两年之内，共送出两个班 40 多名尚未毕业的学子赴法美深造，留学蔚然成风。

辛亥革命后，1912 年 4 月，北洋大学改名为“北洋大学

校”，直属教育部。1913年，又改称“国立北洋大学”。1914年，教育部委任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赵天麟教授为校长，他以《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实事求是”四字，垂为校训，教育学子。从1906至1914年的9年间，该校资送留学生4批共57人（含自费生5人），其中赴美国留学有44人。1917年，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时期，转年，全国举办外交官、高等文官、清华出国留学三项高规格的考试，均由国立北洋大学分获第一名，一年之中连中三元，轰动了全国教育界。1919年，设置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建筑5个工程系。北洋学子们胸怀抱负，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在校学生谌伊勋是天津最早的革命团体“觉悟社”的组织成员、孙毓麟为校学生会会长、陈泮岭任游行队伍的总队长、张太雷被誉为“北洋之光”。1920年，冯熙运接任赵天麟为校长，后因冯压制学生爱国运动，于1924年掀起驱逐冯熙运风潮，迫使其辞职下台。刘仙洲出任校长，聘请刚从美国回国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留北洋授课。侯德榜、温宗尧、石志仁、李书田、雷宝华、闫子亨等知名学者也曾在北洋执鞭任教。

1928年，二次北伐，战火纷飞，北洋大学被迫停课。南京政府因制订北平大学区计划，将北洋大学改名为“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此时，该校又遭遇一次举步维艰的发展历程，校长刘仙洲蒙受当局的排挤和刁难，不仅克扣校方经费，还不时派歹徒持枪拦路恫吓，在忍无可忍的窘境下，刘校长便愤然辞职。学府一度群龙无首，学子们自发赶赴南京，恳请茅以升出山。是年底，茅以升来到天津，任北平大学第

二工学院院长，他从稳定教师队伍、整顿纪律、淳正校风入手，很快恢复了昔日的校风校貌。1929年，大学区制停止试行，校名又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茅以升任院长，继任院长蔡远泽。是年3月31日，正值校方举办欢送应届毕业生联欢晚会，不幸一把大火烧毁了欧式风格的教学大楼，诚为可惜。茅以升以大局为重，收回辞职之念，一腔赤诚，全力以赴，筹募工款，重建校园。并亲赴南京、上海，找到教育部部长和时任政府要员的王宠惠、王正廷等北洋老校友，经多方接洽，从“中比庚款”中筹得10万元，落实了重建资金，建成一幢颇具“双龙戏珠”圆徽标志性的教学大楼。这所当年由茅以升先生筹资兴建的老校区北洋南大楼，今天依然耸立在津沽大地上，可谓茅诗曰“魔火不为灾，新厦俄顷竟。”在民主革命时期，该院是学生运动较活跃的学校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成立了华北学生第一个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该校学生不仅积极投身于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是成立北京、天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倡导者之一，曾倡议起名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爱国举动如星火燎原，席卷全国，拉开了全民抗战的雄壮序幕。这年，学院增设工科研究所，分冶金工程、采矿工程、应用地质3个系，招收各大学优秀工科毕业生入研究所深造，研究两年后，论文通过，授硕士学位。1936年，该校机械系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各项技术指标达世界一流水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攻陷天津，占领了北洋工

学院，使北洋校园再次沦为外国兵营，无奈之下，被迫西迁入秦，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等院校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刚落脚西安的“临大”，面对日军侵略，潼关告急，不得不再次辗转南迁。千余名师生怀着对日寇的憎恨和报效祖国的志向，从城隍庙出发，凭着一双草鞋，一副绑腿，一路穿渭城、赴宝鸡、爬秦岭、过栈道，饿了吃点锅盔，徒步行程250多公里，抵达汉中城固等地。是年4月，更改校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我国抗战时期在西北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设置校本部和文理、教育、法商、工、医、农6个学院23个系及西北联大附中，并云集了黎锦熙、于右任、李达、徐诵明、罗章龙等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1939年，“西北联大”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李书田任校筹委会主任，赖琰首任院长。后迁至咸阳。在城固大山深处办学的7个多春秋，教师们住在用竹泥巴墙搭建的茅草屋生活授课，学生们入驻龙头镇七星寺挑煤油灯夜读……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仍取得诸多科研成果，不仅给汉中人民带来催人奋进的力量和生机勃勃的气象，而且使抗战烽火中铸成的“西北联大精神”在全国广泛传播。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西北工学院部分师生返回天津，北洋根脉落西沽复校，经国民政府批准，恢复了“北洋大学”校名。茅以升、张含英相继任校长，成立土木、水利、采矿、冶金和化学工程等5个工程研究所，增设了理学、工学2个学院共12个系。从此，北洋进入理工结合、开展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的新时期。1947年，北洋大学进步学生率先在津门

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的罪行。解放战争中，学校成立中共地下党组织，党建活跃，战斗力强，被师生称其为“小解放区”。

从梁家园建校始至建国前的 54 年间，北洋大学培养出 3000 多名宝贵的本土本科毕业人才。其中，革命先驱、专家学者颇多。如，中共早期组织创始人张太雷，“五四”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马千里，政治家金邦平，经济学家马寅初，军事家温应星，法学家赵天麟、冯熙运，数学家秦汾，银行金融家钱永铭，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矿冶学家王宠佑，教育家张友巡、罗忠忱、李建勋、齐国梁、齐璧亭，医学家刘瑞恒，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诗人徐志摩，外交家奥运之父王正廷，交通名宿刘景山，盐政名宿钟世铭、朱庭祺等等，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可谓“桃李满天下、英才遍神州”。

四

1949 年 1 月，天津解放。是年 4 月，北洋大学在西沽开学。从 11 月起，隶属于国家教育部，对教师阵容、课程设置、管理体制等进行一系列改革，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新中国成立后，1951 年 9 月，北洋大学除采矿、冶金两系拨给北京矿冶学院外，其余各系与河北工学院、津沽大学、河北大学及南开大学工科合并，重新组建定名为“天津大学”，迁入南开七里台（今卫津路 92 号）。当时，广大师生载歌载舞，

一首由王莘作词谱曲的新歌《歌唱祖国》响彻新校园。在宽阔的北洋校园内，兴建有一座“北洋大学堂”纪念碑亭，始终保留着早年办学宗旨及学风校训等历史印痕，成了激励一批又一批天大学子励志成才的座右铭。

1952年，经国家院系调整后，天津大学设置土木、水利、采矿、纺织、冶金、机械、电机、化工、地质、数学、物理共11个系，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科性工科大学之一。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天津大学。1959年，被定为全国首批16所重点大学之一。“建筑老八校”则天大有名。新中国成立后至1984年，培养出400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为9个国家培养留学生百余人。2015年，该校在津南区建成北洋园新校区。截至2018年，天津大学有全日制在校生33159人，其中本科生17724人，硕士研究生11410人，博士研究生4025人；拥有64个本科专业，39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8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天津大学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之一，国家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位列双一流的“985”“211”工程大学。工科和理工科是天大的特色和优势，在其21个二级学院中，有14个为理工科学院，而且基本上工程类学科均为国家的重点学科。

从清末北洋西学学堂建立至今125年的历史征程中，该校数迁其址，几易其名，唯“北洋精神”锦延不断，始终秉承梁家园大学堂“储才强国”之宗旨，坚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实事求是”为校训，“爱国担当”为传统，“严谨

治学”为作风，薪火相传，改革开放，开拓创新，不仅为国家各行各业输送了大批现代化的栋梁之才，而且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河西区地志办）

天津市河西区革命史之五村农民反霸斗争

天津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随着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 年天津地方党组织正式建立，使天津成为全国较早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从此，渴望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黑暗统治、企盼幸福和光明的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其中五村农民的反霸斗争，就是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一场时间持久、规模宏大的革命斗争。河西区档案馆作为“留凭、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机构，收藏了这段珍贵的历史，值此建党 100 周年到来之际，让我们重溯党史，共同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记忆。

斗争起源

当年天津南乡有五个毗邻的小村庄：贺家口、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和小刘庄。这五个村反对地主“李善人”夺取佃权的斗争，起于一九一五年直到解放。这就是天津有名的五村反霸护佃斗争。

李家原籍江苏昆山，大约在清初康熙年间，北迁到天津落户。李家在天津初露头角的人物是李春城，也就是所谓“李善人”的第一代。这一家族先是经办盐务，继之掘取土地，出租盘剥。李家在政治上因积极帮助清王朝抗拒太平天国的

北伐军而发迹，当义和团运动兴起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们又积极投靠北洋军阀，和袁世凯、曹锟等军阀头子结为亲家。

根据从清朝沿袭下来的制度，五村的佃户拥有永佃权，每年交固定的佃租。由于天津城市发展迅速，地价不断上涨，李家已不满足于租佃的剥削形式，企图取消永佃权，以便随时可以收回土地，改营房地产，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后来竟采取加租、垫地、毁青苗等手段强迫佃农退佃。

一九二六年李氏家族分家析产后，五村土地归“李善人”

的第三代李荇臣所有。他为了实现夺佃的夙愿，玩弄种种欺骗手法，扣留佃农保存的“永佃租摺”，使农民失去凭证。李荇臣还雇用一批流氓打手毁青苗、垫地，致使五十多户佃农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组织领导

正当五村农民岌岌可危之时，彭真来到他们中间。1926年，年仅24岁的彭真，化名傅茂公，来到天津，担任一部委书记。当时，靠近小刘庄有裕元纱厂，这个厂就是现在棉纱二厂的前身；紧邻挂甲寺村，还有北洋纱厂，现在叫棉纺六厂。这两个工厂都已秘密建立了党小组或党支部，彭真直接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他在百忙之中，听说五村的反霸斗争迫在眉睫，就想深入到五村了解情况。

河西柴禾厂旁边有一块空地。那时，经常有西楼村青年在那里耍枪弄棒，练习武功。彭真在这里了解到了“李善人”



198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左）在津会见早起在河西
区从事革命活动的老同志

剥削农户的过程。在这里，彭真向农户聊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变化情况，从北洋军阀聊到了湖南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斗地主的好处；从穷哥们日子不好过，聊到“李善

人”不善。大家都爱听他聊天，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农户来到柴禾厂。

在彭真的长期熏陶下，以青年农民为首的五村佃户们，终于觉醒了，五村佃户迅速组织起来，反抗“李善人”增租夺地。

1927年初，在彭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西楼村首先成立了农民互助会，接着，毗邻的东楼村、贺家口、小滑庄、小刘庄也都组织起来了。

1927年4月，彭真派裕元纱厂地下党员左振玉来到西楼村，发展甄元合为五村农民中第一个共产党员。随后，又先后介绍曹同兴、张连荣、刘树生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五村农民党支部，甄元合任书记。8月，又派第一部委书记司福详到五村参加党员活动，领导五村的斗争。

柴禾厂关闭后，彭真同大家联系的地点转移到“荣园”（当

时是“李善人”家的大花园，现在的人民公园）南门外菜子地。即甄元合住的窝棚里。

1928年，在五村成立农民互助会的基础上，联合成立“五村农民护理佃权委员会”（俗称五村反霸斗争联合会），会址设在东楼玉川居胡同，选出代表。西楼甄元合、杨风池，东楼村刘景同，贺家口华永泰，小滑庄崔宝庆，小刘庄于宝林。甄元合为五村农民总代表。

护佃斗争

为了开展反霸斗争，甄元合、施文兰、杨风池、刘文秀等人在西楼前街22号成立了农民习武的国术馆。每当夜色降临，五村农民就到这里习武，商讨抗霸对策。彭真和左振玉经常在这里召集农民开会，研究五村的反霸斗争。他们一方面设法救济失去土地的农民度过春荒：一方面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1928年底，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千余名群众，主要是农民，也有部分工人和学生，手持各种小旗一起出动，到河北省法院控诉“李善人”。同时，组织了几十个农民李荇臣家里说理，要求停止毁田垫地，明确提出如果不答应条件，将集体拒付地租。李荇臣见农民人多势众，唯恐犯了众怒，只好好答应“已经垫完的就算了，没垫的地今后不再垫了。”这次斗争取了初步胜利。

1929年秋，又开始了他的垫地计划，他把垫地工程包给

承包商，承包商雇佣民工从西楼到西南楼铺设小铁道，用轱辘马把土从西南楼推到西楼垫菜园子。五村党支部闻讯后，联络国术馆一帮小伙子。带领大批农民制止承包商毁田垫地，并动手把铺设的小铁道拆掉，把轱辘车推翻，吓的承包商停止了垫地工程。

李荇臣这次垫地计划未能得逞。他手下的谋士们又向他献上一计，武的不行咱来文的。请律师打官司，咱不告五村农民代表，专告胆小怕事的佃户，一户一户地告，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李荇臣点头称好，于是向法院起诉，并花大钱委托名律师王守臣代办。

李荇臣伪造契约，向高等法院起诉，迫使农民交地腾房。法庭开庭审理此案。五村党支部派人以五村护佃权委员会的名义，动员一些农户去法院旁听，并指定几个能言善辩的农民代表相机发言，揭露李荇臣的阴谋。

开庭后，法庭质问被告为何抗拒所有权者行使主权，被传讯的老农，提心吊胆。不知如何为自己辩护。早有准备的农民代表站起来侃侃而谈，为佃户辩护。法官严厉提出：“你不是被告，不准发言。”农民代表反问：“原告起谁？”这时李荇臣请的律师王守臣傲慢地站起来亮像说：“本律师代表原告李荇臣先生。”农民代表质问法官“既然原告花钱请律师代表他讲话，被告没钱请律师，我们五村护佃委员会就要代表被告讲话，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炮打得法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会场秩序大乱，法官只好宣布休庭。

李荇臣不甘心失败，他一方面再次向高等法院起诉。妄

求佃农交地腾房；一方面花钱买通“官面”上的军警。由李家的收租人魏世珍带领，查封农民代表的家。

五村党支部闻讯后，决定针锋相对，把这场斗争引向社会，争取广泛同情，揭露地主阶级的罪行。

他们联络附近工厂给予支持，请进步教师写了一份《天津市贺家口、小滑庄、小刘庄、东楼村、西楼村五村全体佃农哀告书》，以大量事实列举了农民在地主阶级压迫下的悲惨生活，撕破了“李善人”伪善的真面目，呼吁社会各界都关注事态发展。目前，河西区档案馆就保存了这份哀告书原件，是全国现存唯一的一份，十分珍贵。



五村农民哀告书

这时，彭真同志已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天津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五村农民在彭真培育的五村党支部具体领导下，斗志更加旺盛。1931年，他们组织广大农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六千余人直奔河北高等法院，要求法院院长接见农民代表，提出对地主强占农民土地作出公正判决。

1935年，李荇臣打官司未能如愿，又暗中勾结恶霸李珍，让他跟五村农民捣乱，制造混乱。农民也不甘示弱，纷纷摩

拳擦掌，要跟这帮混混见个高低。同年，彭真获释出狱，负责北方局天津工作组工作。他十分关心五村农民的反霸斗争。当他得知五村农民要与流氓头子拼命时，指示五村党支部：这是“李善人”坐收渔人之利的阴谋，我们不能上当。党员同志一方面耐心作农民工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关系作李珍工作，让他保持中立，结果这场群殴才未发生。

遗址纪念

建国后，天津市人民政府将五村反霸的重要场所——“第三十七”国术馆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河西区政府在全市率先基本完成成片危漏平房改造任务，在原五村反霸遗址上建成了十几座新型居民住宅和拥有万米绿地的西苑



怀翁亭（五村反霸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公园。原国术馆遗址连同周边的破旧房屋一同被拆除。河西区委、区政府在西苑公园修建了“怀翁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追思前贤，彪炳业绩，昭示后人，继往开来。

五村农民反霸斗争自1915年起至

1949年天津进行土地改革，取得最后胜利，离不帶以彭真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场在党的领导下的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揭开了天津农民运动的历史，为党领导农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年鉴条目编写之我见

王文振

条目是年鉴的细胞和基本单元，是年鉴的重要组成部分。条目编写的好坏，直接关乎本部年鉴能否成为精品所在。因此，作为一名年鉴撰稿人，在年鉴条目的编写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条目体的撰写及注意事项，为努力争创精品年鉴打下坚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年鉴主要是通过条目的形式，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完成展现出来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可以说，条目是整部年鉴的灵魂。

一、条目的分类

年鉴中的条目，一般分为三类，即综合性条目、常规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

就综合性条目来说，年鉴中最重要的条目应该是综合性条目，其表现形式是综述、概况等形式，它反映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或一个单位上一年度的主要工作情况、基本信息和基本面貌，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顺序上排在所有条目之前。在年鉴编纂中，撰稿人普遍反映概况条目比较难写，容易写空，不实。因此就要求撰稿人及编辑在撰写综合性条目时，要力

求做到全面性、连续性、可比性，以便给读者提供集中的系统的信息资料。全面性就是要将本年度工作的新成就、新特点、新经验、新问题作全面的概述，使读者对本地区、本行业或本单位的全貌能够一目了然，有一个扼要的了解。连续性是指条目所反映的事务、记述的事实应注意前后联系和上下连接，使读者能够准备清楚地看出事物发展的轨迹。基本资料尤其是重要数据要逐年反映，不能中断。要体现其承上启下，相互连接的关系。可比性，就是要上下照应，横向对比，不仅要同上一年的情况进行比较，还要横向比较。通过比较，可以明确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优势和差距，为读者提供更有价值的资料信息。以某部年鉴的概况为例，“2019年，××区组织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政治建设统领组织建设，强化政治担当，紧盯服务大局，狠抓工作落实，为推进××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类综合性条目的撰写就有些内容空洞，言之无物。再以《北京海淀年鉴（2017）》组织工作概况为例：“2016年，区委组织部工作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区、镇领导班子换届为主线，推进组织工作各项任务落实。发展党员1335名。截至12月31日，全区有基层党组织7282个，中共党员173911名（不包括驻区中央、市级单位和部队等位于海淀区、但组织关系不隶属于海淀区委的党组织和党员）。其中，女党员82037名，占总数的47.17%；少数民族党员6837名，占总

数的 3.9%；35 岁及以下的党员 30894 名，占总数的 17.7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党员 121416 名，占总数的 69.82%。全年调整处级领导干部 228 名，其中提拔 62 名、交流 76 名、改任 90 名；调整处级非领导干部 83 名，其中调研员 22 名、副调研员 61 名，包括行政团职军转干部 50 名。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表彰 100 名优秀共产党员、100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100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上述两个概况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强调一下，概况的写法应为“基础信息 + 大事要闻”。能用数字说话的，尽量用数字形式描述，避免空洞无味。

常规性条目标记述工作的一个侧面，内容相对独立和完整，其主要特征有两个：一是标题相同，内容常新；二是连续记载，不断档。如“公安”分目中的“打击犯罪”“社会治安管理”，“检察”分目中的“刑事检察”“民事检察”，“法院”分目中的“刑事审判”“民事审判”“行政审判”以及“合作交流”中的“招商引资”等，都是常规性条目。以《河西年鉴（2018）》为例，【招商引资】引入华润电力智慧能源（天津）有限公司、中能建（天津）投资有限公司、中交智运有限公司、中电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中交（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津投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天津金隆源典当有限公司、天津银瑞盘鹰典当有限公司等金融、人工智能、新能源等 5000 万元（含）以上高端服务业企业 17 家。促成华润置地增资约 79 亿元人民币入股天津城投置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9% 的股份（这一项目是 2017 年以来，天津市最大一笔成交金额的混改项目），

服务银河购物中心更名为华润自有高端商业品牌“万象城”。常规性条目的撰写因其固有特点，因此在撰写过程中就需要撰稿人在编辑的过程中注重连贯性，与上一年度内容形成对比，在继承上一年度内容的同时，要不断更新、创新，将本年度特色凸显出来，避免与上一年度内容重复，最终做到从延续走向发展。这就要求撰稿人在编纂常规性条目时，需要从条目的系统、连贯、可比方面入手，注意运用数字、新的情况新问题的撰写等形式突出本年度特色。

单一性条目是单独记述某一具体事物的信息实体，是年鉴中最新鲜、最活跃、最有个性的内容，也是年鉴条目的主体。按其反映对象的不同，还可细分为单一记事条目、机构条目、会议条目、产品成果条目及人物条目等。在写单一性条目时，要注意精选条目。要注意做到专、精、新、特。单一性条目叙事记人比较灵活，在年鉴中占有较大比例，它以社会生活中某一具体情况为内容，从微观上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状态和特点，通过具体的事件，准备全面地反映出一个单位的全貌来，也就是从小事入手，力争写出具有全局意义的条目来，特别是那些具有新颖、独特意义的事情、新生事物一定要单独列条。我们可以看到单一性条目少的年鉴，其新颖性和可读性肯定不好，其资料性和信息性肯定不强。总之，对单一性条目要真正精选精编，特别对具有一定价值突出本地区特色的各种“第一”“首家”“之最”要认真记载，对本地区的重要活动、重大事件、重要成果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要表述清楚。

综合性条目、常规性条目及单一性条目，三者相辅相成，

点面结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年鉴的信息资料体系。

二、条目的撰写

（一）条目选材。条目选材就是立条。在浩繁的内容中，什么内容可以写成常规性条目，什么内容可以写成单一性条目，这是年鉴撰稿人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单一性条目的选材。单一性条目要围绕“大事”“要事”“特事”“新事”和“亮点”来选材，选材时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既反映成绩，也反映问题，做到客观求实。例如，我们2019年《河西年鉴》就专门记述了“12·1”城市大厦火灾事故。

（二）条目标题。条目标题是条目的“眼睛”，人们通过标题，就可以判断出该条目的质量。撰写条目标题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项原则：1、一句话标题，忌长标题；2、主题词尽量前置；3、形容词、表程度的副词和抽象性词语不能用。例如：有些部门报送的年鉴条目时是这样的【促进街域经济发展，以优质服务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我们可以直接概括为【街域经济】。

（三）条目要素。条目要素一定要齐全。通常有六要素，即时间、地点、事件、人物、原因、结果，有的条目还需要有背景介绍。条目内容一定要与条目标题相符，这是保证年鉴编纂质量的关键。在年鉴编辑过程中，题文不符是比较突出的问题，要引起撰稿人的高度重视。

（四）条目语言。条目体语言，以说明为主，兼有记叙。其主要特点是：1、简洁，即开门见山，直陈其事；2、准确，

即资料可靠，数据准确；3、平实，即朴实无华，用事实说话；4、不溢美，即客观记述，不把年鉴当做“功劳簿”；5、不隐恶，即秉笔直书，既报喜，也报忧；6、不夸大，即不吹嘘，不造假；7、不缩小，即不隐瞒，不少报；8、不议论，即述而不作，不带个人主观感情色彩。

（五）撰写规范。年鉴编纂虽然是众手所成，但全书表述和书写形式必须做到规范统一，这是年鉴编纂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考验年鉴编辑水平的重要指标。如对单位的称谓，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如河西区档案馆），再次出现时用简称（区档案馆），做到全书规范统一。简称要用规范简称，如“河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简称“区人力社保局”，不要用“区人社局”。

三、提升条目编纂质量应注意的几个事项

作为《河西年鉴》的编辑，通过几年的编纂实践，深深体会到作一名年鉴撰稿人容易，而作一名合格的撰稿人难。现就此谈点个人浅见。

（一）年鉴撰稿人要树立精品意识，努力提升条目质量。我们知道，年鉴是特殊的文化“产品”，肩负着“存史、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年鉴是一种为人们“知往鉴来，温故知新”提供服务的大型资料型工具书，它的作用是其他一般工具书无可比拟的。由于年鉴的这种特殊功能，对其知识的严密性、史料的真实性、选材的实用性，立论的权威性的要求都是很

高的，因此，年鉴的撰稿人要有精品意识，加强责任心和责任感，要有自我加压，争创一流的精神，努力撰写出精品条目。

（二）要有敬业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

年鉴是对外交流的窗口，编好年鉴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严肃的工作。年鉴撰稿人要完成好撰稿任务，必须要有敬业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要把年鉴撰稿当作一项事业来做，而不仅仅是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撰稿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真实地记录和反映现实，要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进行撰写，努力钻研年鉴理论，认真学习中指组下发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及《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补充规定》，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为提高年鉴的整体水平而努力，为后人留下真实、全面、准确、详实的历史资料，为繁荣年鉴事业而无私奉献。

（三）全面收集资料、精心组织加工

一年内，一个地区内各方面发生的变化很大，如何全面客观反映出一年的变化，就需要统筹全局，在选材上全方位考虑。首先是视野要宽广，要及时捕捉信息，要注意广泛收集资料，资料积累工作做得越细越好，越多越好。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我认为年鉴资料来源主要是各系统、各部门提供的年度工作总结、各类统计表、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各类档案、信息、照片等，只有掌握大量资料，才能进行比较筛选，将主要的有价值的资料收入年鉴，从而达到优化选择的目的，为编写打下坚实的基础。

精心组织加工是确保年鉴稿件质量的关键。对资料进行

深度加工、精细化加工是决定年鉴稿件质量的关键所在。通过对原始信息资料进行认真筛选、对比、类比、综合概括，把能反映一个地区内一年的全面情况和主要成果、有影响的事件等信息资料，通过条目反映出来。

总之，年鉴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工程，必须加强撰稿人及编辑的精品意识，使每一个年鉴撰稿人进入角色，才能抓出精品选题，编出精品条目，从而创出精品年鉴。

（河西区档案馆提供）

天津德式风情区始末

王文振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被称为“万国建筑展览馆”。河西区作为天津重要的中心城区之一，德国租界就坐落在河西区内。德式风貌建筑和众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天津市也是河西区的重要文化遗产。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会同天津道李岷琛，与德国领事司艮德签订《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中文称《德国租界地合同》）。其规划四至范围：东起台儿庄路、西至大沽南路、南到琼州道、北至徐州道，规划总用地面积 0.47 平方千米，规划可用地面积 0.12 平方千米。规划目标重在体现欧洲特色，选定风情区核心区域重点营造。体现亲水特点，合理组织滨水空间，延续历史街区文脉，通过对风貌建筑保护性整修及历史街区形式的延续，加深此地区城市形象。在德式风情区内，曾是近代名人荟萃之地，仅民国官员、企业家、建筑师、文化名人及德国名人家族人数众多。德式风貌建筑和众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天津市也是河西区重要文化遗产。其建筑包括名人旧居、公寓、兵营、教堂、会馆、电影院、博物院、宾馆、餐馆、学校、医院等。天津德式风貌建筑区形成时期正值西方建筑学发生巨大变革时期，呈现中西合璧

的建筑风格。

一、天津德式风情区的建设及由来

天津德式风情区内的德式风情街通过充分挖掘历史风貌建筑资源，着力打造集旅游、休闲、购物等功能于一体的德式风貌街区。保护历史风貌建筑，挖掘风貌建筑历史及文化底蕴，重建历史风貌建筑，以现有的与重建的俄德式建筑群为载体，吸引中外企业和公司入驻，形成德式风情区。

河西区境内从徐州道至琼州道的解放南路两侧的德式风貌区建筑，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德式建筑群。天津的德租界，是在德帝国主义策划对华侵略政治背景下开辟的。早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天津开埠以前，已有德国商人到天津做生意，当时多分散居住在城里及东门外一带。直至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及英、美、法三国在紫竹林一带设立租界之后，德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居住。德国要求享受与英、法等国同等的特殊待遇。1895年6月，德国驻华公使绅科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交关于在天津设立租界的照会，清政府授权天津海关道办理。于1896年1月，在天津设立德租界。八国联军侵华后，司令官瓦德西在天津停留期间，将其军司令部设于德租界梁家园北洋大学堂校舍内（遗址为海河中学德国租界道路图及解放南园），并在德租界及其附近三义庄、桃园村一带露营、放马和存储军械粮秣，其所占之区域，皆纳入德军的统辖之下。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派天津海关道唐

绍仪接受联军都统衙门时，德租界当局将德军所占据的土地划为新界。德租界向西与南方向扩界，沿琼州道与大沽南路交口处向南至围堤道再向西北到李家花园（后为人民公园），沿桃园村大街至马场道，折回东到南京路与大沽路交口处。扩张后的德租界地界：东临海河，北与英租界接壤，南至琼州道，并从下瓦房向南延伸至围堤道附近再向北折回琼州道；西界沿广东路向西至马场道，总计 2.8 平方千米。面积之大在天津的九国租界中居第三位，仅次于英、俄租界。

1902 年，德租界扩界后，包括安辛庄、开千庄、丁庄、大土地庙、下瓦房等几个小村庄。现在广东路医科大学东院原处，设有一个美国驻军营盘，营盘北部是美军司令部。美国营盘西侧有美军家属住的房子，俗称美国大院，即荣华里。美国大院和家属大院西邻是陶园游艺场（今新华中学址）。在小刘庄浮桥北面，德国人开设一个硝皮厂，厂后一块空地，南至琼州道，西至解放路，北临温州道，东至台儿庄路，作为跑马场，当时人们俗称德国马圈。1917 年，天津闹大水，淹没很多村庄。由世界红十字会拨款、美国监工，在这里用苇把子盖起临时窝铺 840 余间，收容津郊灾民 840 余户。美国教会把灾民子女送到耶稣教办的临时学堂上学。赈灾窝铺的西面是德美医院。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 年 3 月 14 日，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宣布与德国绝交，收回德国在华租界，直隶警务处处长杨以德遵照国务院的指示，接管天津德租界，并组建特种财产管理局，取代德租界工部局。是年 8 月 14 日，中国又宣布对德国及奥匈帝国作战，

并于9月1日，与协约国达成协议，收回德、奥两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取消两国的治外法权与庚子赔款。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后，于1919年在巴黎郊外凡尔赛宫召开和会，6月28日签订《凡尔赛和约》，其中第一百三十二条确认中国收回德租界的正当权益。联军德式风情街以解放南路为主线，以福建路、琼州道、台儿庄路、奉化道围合的区域为片，整修、重建历史风貌建筑，通过保护、重建和综合治理环境紧密结合，使历史风格与现代功能紧密结合，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紧密结合，深度挖掘德式风情街商业价值，综合整治德式风貌区的环境，努力建设海河沿岸环境优美、功能多样、集历史人文价值与商业价值于一体的德式风情街。谈起天津德式风情区的建设，不能不说说天津德式风情区的形成，即天津德租界的历史。

二、天津德式风情区的形成

天津的德租界，是在德帝国主义积极策划对华侵略的这利开辟的。早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天津开埠以前，已有德国商人来天津做生意，当时多分散居住在城里及东门外一带。直至天津被辟为通商、法三国在紫竹林一带设立租界之后，德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的美租界在划定后一直没有建立行政机构，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民便大批涌入美租界，至于德国人开办的洋行，则多设于英租界。光绪六年（即1880年），美国政府对清政府表示“亲善”，曾声明愿将美租界“退

还”中国，清政府为取悦于德国，有意把美租界委托德国代管，驻津美国领事闻讯后曾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德国要求享受与英、法等国同等的特殊待遇。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6月，德国驻华公使绅科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提交关于在天津设立租界的照会，清政府授权天津海关道办理。同年10月，天津海关道与德国领事司艮德签定了《天津条约德国租界协定》（中文称《德国租界地合同》），于1896年（光绪二十一年）1月在天津设立德租界，占地1034亩。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德租界划定后，租界当局对租界内的道路修筑不愿意多投资，除了一条主要街道——威廉街（今解放南路）外，大部分地区仍然保持原貌。尤其是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扩张的新界，道路建筑依然没太大的变化。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后，其他各租界竞相筑路，对德租界当局有一定的影响，修路问题也逐步得到重视，并进行了规划。以威廉街为中心，先后修建了海滨街（今台儿庄路）、穆姆街（今徐州道）、罗尔沙伊特街（今蚌埠道）、俱乐部街（今江苏路）、纪念碑街（今海河西路至大沽路间的浦口道）等30多条道路，但大多是土道和碎石路。直到1923年，威尔逊路（即威廉街，今解放南路）才铺上沥青。随后，其它各条道路也逐步改造成沥青路。德租界在进行道路建设的同时，加快了公用建筑和民用建筑的建设，重点是威廉街（今

解放南路)与沿河码头。在威廉街两侧,陆续出现了具有日耳曼民族风格的建筑。领事馆、工部局、武官府、德华学校(今海河中学址)、俱乐部(今市政协礼堂)、起士林面包房等以及德国官员、商人的住宅。德国人很重视绿化,所有的马路两旁都栽有中国槐树,并派专人常年整修。德租界排水系统是雨水污水分流制,雨水多采用明渠排入海河,污水采用混凝土管材的地下水道排入墙子河。

德国人在租界内设有德国营盘,它和德国工部局都在威廉街上(现在的解放南路),这是德租界的“心脏”,管理租界内的一切事务。德国在租界内设有巡捕房两处,一处设在徐州道工部局内,另一处设在德国兵营南半部。德国在租界内还设有司令部后改为领事馆(现解放南路浦口道东北角处)、德国球房(现市政协俱乐部)、电灯房(现蚌埠道西口路北)。

在解放南路、浦口道十字路口原址处还建成了一个小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高约十米的头戴钢盔、手持宝剑和盾牌的将军铜像,此人名叫卢兰德,曾因征讨法国有功被德皇封为边疆伯爵,后来在与西班牙作战时牺牲。在铜像前还陈列着一门废弃的大炮。在德租界内矗立卢兰德像与放置大炮,寓意为对中国的征服。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消息传来以后,天津的英、法、美各国商团用大绳将铜像拉倒。

德租界扩界后,还包括几个小村庄:安辛庄、开千庄,丁庄、大土地庙、下瓦房等。现在广东路医科大学东院原处,还设有一个美国驻军营盘,营盘北部是美军司令部。美国营盘西侧还有美军家属住的房子,俗称美国大院,即荣华里。美国

大院和家属大院西邻是陶园游艺场（今新华中学址）。在小刘庄浮桥北面，德国人开设了一个硝皮厂，该厂从华北、山西、内蒙一带购来生牛皮，在这里加工制革后，再向全国各地推销，部分留作德国军队用。在硝皮厂后有一块空地，南至琼州道，西至解放南路，北临温州道，东至卢兰德像及放置的大炮台儿庄路，这是德国人作为跑马场用的，当时人们俗称德国马圈。1917年，天津闹大水，淹没了很多村庄。由世界红十字拨款、美国监工，在文用芦苇把子盖起临时窝铺840余间。收容津郊灾民840余户，收容期限为六个月。在收容期内，美国教会把所有灾民子女进行登记，令其到耶稣教办的临时学堂去上学。在学堂里学唱“耶稣爱吾”等歌，并让学生学习“福音”等内容的书。学堂就设在窝铺北面，即现在的东光大楼及人民印刷厂西半部。赈灾窝铺的西面就是德美医院，该医院设备比较完善，在这里住院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或者是中国的官僚，一般人是住不起的。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先后向俄、法、比等国宣战，英国也宣布对德国进入战争状态。1917年3月14日，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宣布与德国绝交，收回德国在华租界。

德租界收回后，改称特别第一区（简称特一区，设特一区公署、第一任公署主任为卢篆；1924年继任的公署主任为黄一欧。1943年特一区改称第六区。直到1956年1月才改为河西区。

三、天津德式风情区的建筑及特点

原德租界各种机构的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经过百年的风雨沧桑，大多已不存在。原德国领事馆位于威廉街（今解放南路 281 号），原为两所二层德式楼房，1976 年地震受损，拆除后建起 7 层大楼，由武警部队使用。原德国兵营位于德国花园后，原房屋已拆除，重建新楼。琼州道 2—4 号为原德美医院，归河西医院，现原房已拆除。德华学校为现海河中学，原建筑也不存，为新教学楼。民国总统黎元洪的荣安别墅已拆建两次，现为泰达大厦。民国“文治总统”徐世昌德租界旧居为闽侯路小学，在 1976 年地震中毁坏，盖起新的教学楼，海军大臣载洵旧居拆除后为浦口道 23 号，现闽侯路小学校教学楼。

现保存较完整的德式风貌建筑，大体分布在解放南路两侧的道路和胡同，如徐州道胡同，福建路 1 号、6 号-28 号、19 号~29 号、福建路的增禄胡同、增延胡同（德国大院），宁波道 30 号~42 号，河西医院对过的三角地——由琼州道、解放南路、温州道围成，还有台北路 19 号、30 号至 50 号、敬爱里，台湾路（从奉化道到绍兴道左侧），宁波道 1 号（丹麦领事馆），大沽南路 361 号（德国军官住宅小楼）、大沽南路电灯房胡同，镇江道 2-24 号德式尖顶小楼，以及南京路上的袁世凯大营门老宅、王郅隆旧居，浦口道 6 号的张勋旧居，解放南路的吴毓麟旧居，台北路上袁克定旧居（今河西区委），

德国俱乐部（今解放南路政协礼堂）等。近几年随着城市市政建设和改造的加快，其中有些德式建筑已不复存在。

天津德式风情区的德式建筑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造型及装饰上具有显著的日耳曼传统色彩。如德国俱乐部（今市政协俱乐部），也称德国球房、德国总会，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5月动工，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7月竣工。占地面积633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922平方米，是三层砖木结构。属于新罗马式风格，在造型及装饰上具有显著的日耳曼传统色彩（1976年地震房屋受损，重修时在结构及造型上多有改变）。木屋架，牛舌瓦和瓦陇铁屋面，有阁楼和老虎窗，山尖和尖顶较多。一层窗台至室外地坪以及门窗券皆用天然石料砌筑。门窗多是半圆拱券，系德式建筑造型。又如王郅隆宅邸，建于1911年。建筑面积2480平方米，为德国花园式宅邸。二层砖木结构带地下室，平面近似矩形，立面入口高台阶，大理石饰面，双柱支撑折角门廊。牛舌瓦多坡屋顶，转角处设多边形角楼。客厅、书房、餐厅，分别设凸窗、角窗、弧形窗，大灯内设木玻璃隔断。室内装修有护墙板，筒子板，硬木人字地板，以及木制弧形楼梯，为典型的德国传统建筑风格。

二是以德式建筑风格为主，但有明显的折中主义倾向，将各种建筑风格融为一体。如德国俱乐部是以德式建筑风格为主，但楼梯间作为室内装修的重点。利用楼梯的复杂形体变化和空间的穿插，对楼梯的立柱、栏杆等，饰以精美的雕刻，栏杆做成由华美小立柱支承的两跨连续的小拱券。中间

还夹有雕刻云彩头的实心小栏板，两侧立柱雕刻有纹绳状花纹，上面各有一座雕像，右者右手执矛，左者左手执盾，雕像做工精美华丽，别有特色。另外，还有两座辅助楼梯可由地下室直通三楼阁楼间。大厅和过道都以半圆券和椭圆券承重，尤其在大厅交汇处更为壮观。壁炉、吊灯、木护墙板以及券脸、券脚、腰线、装饰灰线等均吸取了巴洛克式的装饰手法，融合了多种建筑风格，有非常明显的折中主义特点。

三是呈现中西合璧的特点。如张勋公馆的前卧虎，后蟠龙，进门左侧有八角震灾亭，在德式风貌建筑上有吉祥植物装饰；王郅隆宅邸有中国古典式的六角单檐攒尖顶亭，原有戏台；吴毓麟宅邸北楼与南楼之间的庭院花园，用一条中式长廊连接。客厅装饰有各式人物彩绘；德国大院屋顶前后出檐，檐下通风孔用中国铜钱装饰。这些都是将中西建筑文化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

如今，河西区把德式风貌建筑区作为天津市海河两岸综合开发改造工程河西区段的重要节点之一，确立保护重建与综合治理环境、历史风格与现代功能、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的思路，挖掘德式风情街商业价值，打造出一条独具河西特色的亮丽风景线，让后人永远铭记这段难忘的历史岁月。

（河西区档案馆提供）

挖掘红色档案资源，讲好河西故事 对策与研究

河西区档案馆 彭太刚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的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变幻，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历史自信，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次参观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国家版本馆，我更加深切感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红色档案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推进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工作，充分利用红色档案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河西故事势在必行。

一、红色档案资源记录革命历史，蕴藏无限精神力量

红色档案是真实反映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以及

发展的历史材料，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经验以及教训。党和国家历来对红色档案工作给予高度的关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曲青山曾经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那么由此而言，红色档案按时间则同样可以划分为四大类，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可以细化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档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包含抗美援朝时期档案。

不同历史时期的红色档案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传承着不同的红色基因和精神力量。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档案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包括红船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档案所蕴含的艰苦创业精神，包括抗美援朝精神（含上甘岭精神）、大庆精神及劳模精神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红色档案所蕴藏的改革开放精神，包括这一时期小岗精神、拓荒牛精神和特区精神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色档案所蕴藏的新时代伟大奋斗精神，包括爱国创业精神及抗疫精神等。但在不同阶段的红色档案所传承的红色精神中又蕴含着相同的力量，它们记录着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了实物依据，是我们持续开展党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史料依托。

二、挖掘现有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近代中国看天津，天津近代看河西，河西区作为中国近代工业、教育、医疗事业的发祥地之一。既是中国最先吸纳西方工业文明并形成独特工业文化的城市，也是中国大学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祥地，医疗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医院群。河西区各行业在近代形成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典型代表：如德美医院的奥地利共产党员傅莱在天津期间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党领导第六区（今河西区）学生投入“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下的天津总工会组织工人罢工等革命历史事件等等。这样的历史背景，诞生了大量涉及工业、教育、医疗等行业珍贵的红色档案资源，这些档案至今仍散落在河西区的各处，亟待挖掘和保护。

为了挖掘和保护这些档案资源，河西区档案馆坚持“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使命担当，成立红色档案保管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积极担负起档案部门在红色档案保护传承中的职责。从加强红色档案保管保护力度、助推红色档案资源集中整合等方面入手，着力提升红色档案保管保护和开发利用水平，紧扣发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这条主线，制定《河西区档案馆红色档案资源保管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方案》。建立规范化的红色档案资源专题目录，助力全市红色档案资源有效整合、深度融合。加强对红色档

案资源的保护，对年代久远、保管状况不佳的红色档案，通过制作仿真复制件、进行数字化等措施开展抢救性保护，为红色档案资源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河西区档案馆现存红色档案资源文书 11022 件、照片 1533 张、实物 292 件、电子文档 256G，其中包括五村反霸斗争档案、抗日战争档案、抗美援朝档案、抗震救灾档案、脱贫攻坚档案、抗击疫情档案和河西区知名英雄劳模的专题档案等共计 16 大类。通过对馆藏红色档案进行排查梳理和深度挖掘，河西区档案馆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利用馆内红色档案资源建成河西区历史展及临时展览，出版《河西岁月》一书，引领参观者认识河西、了解河西，感受河西历史发展的光辉岁月，激发爱国热情。

三、传承红色基因，讲好河西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讲好河西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党史故事的组成部分，讲好河西故事是为了更好地讲中国故事和党的故事。因此讲好河西故事，也是要讲好河西区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接续奋斗的故事，这是我们传递河西声音，传承河西历史文化，赓续红色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充分发挥红色档案资源“存史、资政、育人”价值，让档案“活起来”的重要方式。

一张张档案史料，一个个红色故事，一段段革命历史，一次次精神洗礼，在河西区这片热土上镌刻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辉煌斗争历史，这里曾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爱国运动、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这里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和河西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这里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河西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一往无前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河西人民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美好幸福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历史见证。从党的革命历史文化富矿中汲取营养，从社会主义建设先进文化中把握时代脉搏，深挖河西区革命文化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是档案人应尽的职责和使命，这些红色历史故事，透过岁月的尘封，让我们看到一幅幅为了获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壮烈画卷，展现出中华民族英勇无畏不怕牺牲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需要我们永远传承和歌颂。在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领导河西人民始终以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意志，以前所未有的智慧和力量，努力将河西区打造建设成经济强区和品质之城。讲好河西故事，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河西人民奋斗的故事，从中展示出当代河西人的良好道德情操、朴素生活理念、宽厚包容品质，使更多人了解河西、认同河西、热爱河西，真正参与到河西的建设工作中来。讲好河西故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责任，它时刻提醒着我们，要不忘来时的路，坚守初心使命，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行。

四、河西区红色档案征集利用工作基本情况、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3年以来，河西区档案馆多渠道深挖红色档案资源，通过在河西区有线电视台新闻栏目、河西有线公众号和区档案馆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为做好档案的征集工作，区档案馆主动到各社区上门入户了解情况，在各街道社区张贴征集公告积极开展红色档案资源征集工作。现已征集到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等活动的档案资料，建国初期的红旗手奖状、奖章等，社区居民捐赠的天津市计划经济时期的有关票证，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捐赠的主持编纂的书籍、书稿文稿、证书、照片以及电子文档等珍贵档案资料共计约三百余件。

存在问题：一是现存红色档案资源馆藏数量不足，没有充分拓展档案征集渠道，公众参与红色档案挖掘保护利用热情不足；二是征集来的档案质量参差不齐，档案类型同质化严重，对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较大的阻碍；三是档案的整体利用率偏低，存在重保管轻利用的情况，档案利用形式单一，深入挖掘红色档案资源的内在价值缺乏创新方法。具体原因分析：一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红色档案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缺乏深入的理解，热爱河西、了解河西、宣传河

西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足。二是公众及档案专业人员对红色档案资源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对红色档案资源缺乏保护意识，导致一些珍贵的红色档案资源得不到重视；三红色档案资源保护利用工作起步较晚，缺少值得参考的范例和指导性的法规文件，在档案类别划分、档案价值判定上没有形成一套规范化、系统化的体系，因而征集来的档案不仅缺乏质量，利用起来也不够便捷。四是缺乏对专业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对红色档案资源价值鉴定和创新型利用方面，缺少一支高水平复合型的专业人才队伍。

五、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路径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从红色档案中汲取奋进力量，建设特色档案资源库，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充分发挥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要从多方面入手解决现存问题，利用好现存的红色档案资源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河西故事。一是打造“磁性河西”用鲜活的河西故事吸引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红色档案工作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把握好红色档案资源的内涵和宗旨，凸显党和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精神力量和鲜明特质，将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起来，将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与落实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扎实有力推进“1 + 10”实施方案全面落实落地结合起来。让档案“活起来”，用丰富多彩的河西故事留住人，用鲜活的河西故事吸引人，打造好的营商环境

助力河西经济社会发展。二是要强化理论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红色档案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学习《天津市红色资源保护和传承条例》，利用“6.9”档案日等关键时间节点加大宣传力度，向公众宣传红色档案的重要意义，形成保护利用红色档案资源的良好氛围。三是深入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红色档案资源保管利用体系。要多渠道开展宣传，增强全社会对红色档案资源重要性的认识；要探索多种征集方式，全力征集社会上散存的红色档案资源，全面记录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建设一个覆盖面更广，结构更加合理，内容更加丰富的档案资源体系，为讲好河西故事提供源源不断的档案素材；要制定一套完善的红色档案资源鉴定、分类、保管利用的制度和流程，规范化保管利用档案资源。四是创新红色档案资源利用方式，盘活红色档案资源。要将红色档案资源利用与现有的数字化档案馆建设工作结合起来，在继续做好传统档案展览和影视节目等档案利用方式的同时，探索利用新媒体提升红色档案资源利用效率。五是要尽快通过组织专业培训或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方式培养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河西区档案方志专家组指导作用，通过定期举办红色档案文化讲座，邀请专家学者为馆内参与红色档案资源保护利用的工作人员授课，联合开展关于红色档案的教学实践活动等方式提高其业务能力。

为进一步挖掘红色档案资源，真正讲好河西故事，在今后的工作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对标“四个好”、“两个服务”目标要求，坚定“三个走向”不动摇，服务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和河西区“1+10”实施方案，全面推进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向纵深发展，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到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中来，深入学习研究《天津市红色资源保护和传承条例》，强化科技和人才支撑，不断推动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工作走向依规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为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卫津河上繁忙的砖瓦运输

卫津河是天津市区贯通西郊和南郊区的河道，全长约 65 公里。历史上这两个郊区的砖瓦业发达，卫津河运输一直是窑厂进出货物的主要方式。1949 年天津解放后，50 多家窑厂煤土原料和砖瓦，通过木船运往市区，支援重点项目的建设。这些窑厂砖瓦日产量可达四五千吨，约占全市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八十。窑厂多在卫南洼水域地区，只有冬季和开春可路运，且成本高，运量低，砖瓦等货物主要靠木船运往码头，再用车辆转送工地，有的由船直达工地。1949 年，卫津河上从事运货的木船约有 280 只，大部分来自市郊的李七庄、凌庄、万德庄、小孙庄和山东省单县等地。其中，砖瓦联营社所有者 57 只，各窑厂所有者 13 只，租船使用者约 50 只，其余大部为船民自有船，有一小部分船上雇用二三名工人。这些船载重量大多在 10—20 吨之间，最大不过 30 吨，且设备简单，集中在卫津河上，依附砖瓦窑业，从事砖瓦和煤、土等外运，与窑厂形成协作与共存的关系。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建材先行。天津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建材工业，没收旧官办砖厂，改建为国营砖厂，扶植私营企业，给予贷款，调拨给原材料，短期内砖瓦窑业生产得到复苏。1951 年，生产砖达到 38000 万块，比历史最好水平的 1944 年增加 41%，生产瓦 523 万片，比历史最好水平的 1940 年增加 12%。1952 年，共生产砖 58994 万块。

卫津河木船业投入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等重点项目砖瓦运输任务。其中有：工人新村5万间住宅的建设，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三大学府的建设，修建大沽南路和飞机厂等。

在执行工人新村运砖任务时，减收运费，保证运输质量；为三大学府联建工程和儿童医院工程皆以船运砖直达工地；修建大沽南路尖山到珠江道路段。与陆运相比船运为国家节约运费30万元；在市里污水改建工程中，日运送100万块砖，约运半年之久，用砖量达到45万吨（一吨折400块砖）之多。1951年，修建杨村机厂共用砖1200万块，从10月31日开始至11月10日10天内运齐，供应方集中于西、南郊的十几家大窑厂，任务重，限期紧、责任大。10日共运360万块，由窑业公会先将砖运至车站，再用车皮运往杨村；河路由窑业公会运输360万块。程序是：由窑业公会先用小船运到市内墙子河至海河闸口一带，再由运输公司转运河北省航运的大船运到北仓，然后由市运输公司以汽车运到杨村；陆路共运180万块，由市运输公司运送220万块。河北省运输公司运260万块，分头由市内各窑直运杨村。运砖任务如期全部完成，其中河运出动大小船只117只，装卸工1525人，共运红砖691980块，碎砖1497.2立方米。

自1949年，卫津河木船业统一由砖瓦联营社管理和调配。联营社系由85家私营窑厂组成，统管各厂产、销、运。1951年7月，市运输公司窑业办事处接管砖瓦联营社。从行政上按船只大小和船民居住地进行编组编队，加强组织管理，组

建工会，吸收船工参加；实行统一货源、统一调度、统一运价政策。到1952年底，参加编组编队船只增加到362只，船工船民达到1034人。1953年，政府收买13家私营砖厂，接管4家公营砖厂，进行公私合营经过民主改革，船工船民建立自己的民主管理组织——船民协会。

天津市大规模建设，对砖瓦需求激增，在卫津河河坡地段修建长达3000米的砖瓦水陆联接专用码头。卫津河木船年货运量达44.3万吨、周转量达354.7万吨公里，比1952年提高53.96%。1954年，砖瓦运输任务持续增长，一部分外县船只转到卫津河参加运输，船只增到433只，货运量达56.8万吨，比1953年提高28.16%，周转量达530.1万吨公里，比1953年提高49.44%。是年汛期，天津雨量集中，持续很久，五大河汇集，洪峰下泄，甚为严重。卫津河木船全部安排在卫南洼一线，运输防汛器材，抢救物资，运送灾民脱险。1955年，全国农业合作化，一部分外地船民带船回乡，船只减为423只，运量下降。1956年，外地船只大多数回乡加入农业合作社。市区船、市郊船、静海船减为123只。船工船民345人，根据自愿原则组建“建国门木船运输合作社”。由于汽车运输较快发展，加之卫津河道逐渐淤浅，一些窑厂逐渐南迁，砖瓦运输舍水就陆，逐步为汽车、马车所代替，木船运输渐趋萧条。以建国木船社的社员和新排的对槽船和原有旧木船为基础，筹建“天津市航运公司”，部分船工出卫津河到海河从事航运业。建国木船社被撤销，卫津河上木船业遂即衰落。

彼时，卫津河上仍有四五十条小船运输，主要来自市郊的小孙庄、纪庄子、李七庄、凌家口、王兰庄、大任庄以及献县等地，所运物资为黄土、肥料、黄土、砖等。曾利用长江道码头坚持水上运输近2年。

到1959年，窑地旱路四通八达，原有卫津河道有的插箔养鱼，有的被杂物淤填，运输的小船一部分报废，一部分去汉沽。至此，卫津河上的砖瓦运输遂废。